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15.2

一年出版三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印度社会学

Rajesh Misra
Maitrayee Chaudhuri
Indira Ramarao
Arvinder Ansari

激进化的主流

Sabrina Zajak
Emanuele Toscano
Anna-Maria Meuth
Terri Givens
Damla Keşkekci
Pasha Dashtgard
Andrea Grippo
Sumrin Kalia
Roberto Scaramuzzino

理论观点

Anaheed Al-Hardan
Julian Go

议题开讲

- > Darcy Ribeiro 与来自南方的全球理论
- > 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工具化与对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的多重压制制
- > 破碎的城市：对伊朗反女性都市主义的批判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5卷/第2期/2025.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编辑的话

为 本年度第二刊打头阵的，是以印度为焦点的专题！印度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社会学界之一。在本期的印度社会学专题中，五位来自印度的顶尖知识份子，探讨了不同面向的议题，例如本土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们为去殖民化思潮的持续付出、印度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与地域性，以及女性主义与社会运动的影响。借由讨论这些印度的核心议题，我们向成立于1951年的印度社会学学会致敬，该学会将于2025年12月举办第50届年会。

本期的核心专题，主要讨论极右派的正常化。本专题由 Sabrina Zajak、Emanuele Toscano 和 Anna-Maria Meuth 策划，这七篇文章指出，极右势力已经成为「新常态」。他们刻意将这种趋势描述为「激进化的主流」，指出专制、性别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反移民、反权利、反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正常化。作者分析了极右势力如何采取极为多元且不段演进的策略，并借此取得正当性、重塑政治与文化环境。他们探讨极右政治在欧洲政党体系中如何正常化、数位平台在极端主义内容主流化中的角色，以及男性自我提升的激进化。极右派与时尚的接触，被分析为认同形成与意识形态扩散的微妙且有力的工具。此外，文章中也深入探讨极右势力如何在全球与地方化的背景下渗入公民社会，以及民粹主义政权如何为了贴合专制与排他议程，而重构了公民空间。

在「理论观点」中，巴勒斯坦社会学家 Anaheed Al-Hardan 和美国社会学家 Julian Go 指出，反殖民思想是批判性社会理论的重要根源。他们认为，反殖民抗争挑战了帝国主义认识论最初的概念与见解。他们提

出，与其让批判植根于地理认同，不如以反殖民主义立场，作为异己理论 (dissident theory) 的基础。

最后的议题开讲，则以三篇涉及不同主题的论文为本期刊物总结。第一篇文章重温巴西思想家 Darcy Ribeiro 的遗绪，以及他对全球社会学的贡献。第二篇文章由德国的脉络来分析加萨战争，并讨论反犹太主义的工具化、异己者的沉默，以及在学术和公共领域中，针对巴勒斯坦的声援，如何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压。最后一篇文章，则批判了妇女如何在伊朗都市空间的制造过程中被沉默。

Global Dialogue 的创始编辑 Michael Burawoy 不幸过世，本刊的下一期，将会以纪念他为主题。如果您想要投稿或给予建议，欢迎与我们联系。■

Breno Bringel，《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发布于 [官方网站](#)。

> 投稿请寄信至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编辑：Christopher Evans.

执行编辑：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区域编辑团队

阿拉伯世界：(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亚)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Mohammad Jasim Uddin, Shaikh Mohammad Kais,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Touhid Kha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Rasel Hussain, Ruma Parvin, Yasmin Sultana, Sadia Binta Zaman, Farheen Akter Bhuiyan, Arifur Rahaman, Ekramul Kabir Rana, Alamgir Kabir, Suraiya Akter, Taslima Nasrin, Nasim Uddin, S. Md. Shahin.

巴西：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Carine Passos.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印尼：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rio Seto, Nurul Aini, Aditya Pradana Setiadi, Rusfadia Saktiyanti Jahja, Harmantyo Pradigto Utomo, Gregorius Ragil Wibawanto.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兰：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罗马尼亚：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Elena Mihăilă.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湾：李宛儒, 郭智豪, 黄翊硕, 赖奕玮, 林韵柔, 吕道咏, 李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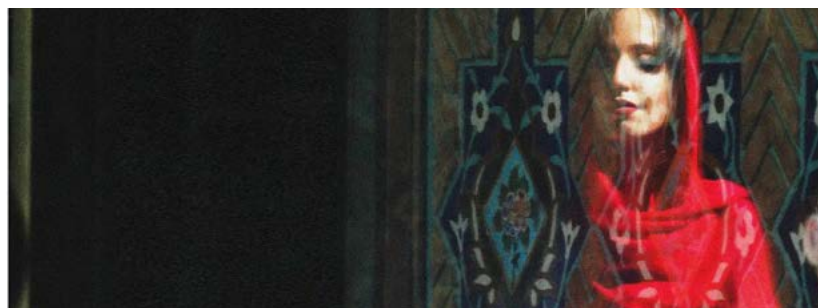
土耳其：Gül Çorbacioğlu.



在专门讨论印度社会学的专题部分，介绍了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具活力的社会学社区的一些辩论。



在极右翼势力的正常化与激进化的主流的部分，探讨了一直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事物如何成为新常态。



议题开讲中包括不同的主题，包括巴西思想家Darcy Ribeiro的遗著、德国背景下的加沙战争以及伊朗城市空间中的女性。

封面来源：Taurino，Marajó（巴西帕拉州）的渔民。
摄影：Lara Sartorio Gonçalves，2025年。



Global Dialogue 由SAGE赞助

> 目录

编辑的话	2
> 印度社会学	
差异的对话： 本土思想与西方社会学 Rajesh Misra，印度	5
印度社会学的日常实践： 回顾去殖民 Maitrayee Chaudhuri，印度	8
南印度的社会学 Indira Ramarao，印度	10
印度社会学中的女性： 女性主义贡献、教育学与实践 Arvinder Ansar，印度	12
身在印度的社会运动研究反思 Shruti Tambe，印度	15
> 激进化的主流	
极右势力的正常化与激进化的主流 Sabrina Zajak，德国、Emanuele Toscano，义大利 和Anna-Maria Meuth，德国	18
从「激进」右派到主流右派： 欧洲政党系统的转向 Terri Givens，加拿大	21
从边缘到核心： 在社群媒体上成为主流的极右派 Damla Keşkekci，义大利	23

优化阳刚气质：男性自我提升的网路与意识形态战场 Pasha Dashtgard，美国	26
极右派对时尚的武器化 Andrea Grippio，奥地利	29
极右翼如何侵蚀了公民社会 Sumrin Kalia，德国	31
民粹主义治理对公民社会倡议的影响 Roberto Scaramuzzino和Cecilia Santilli，瑞典	34
> 理论观点	
历史与社会理论中的反殖民主义 Anaheed Al-Hardan和Julian Go，美国	37
> 议题开讲	
Darcy Ribeiro与来自南方的全球理论 Adelia Miglievich-Ribeiro，巴西	40
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工具化 与对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的多重压制 多位作者，德国	43
破碎的城市：对伊朗反女性都市主义的批判 Armita Khalatbari Limaki，伊朗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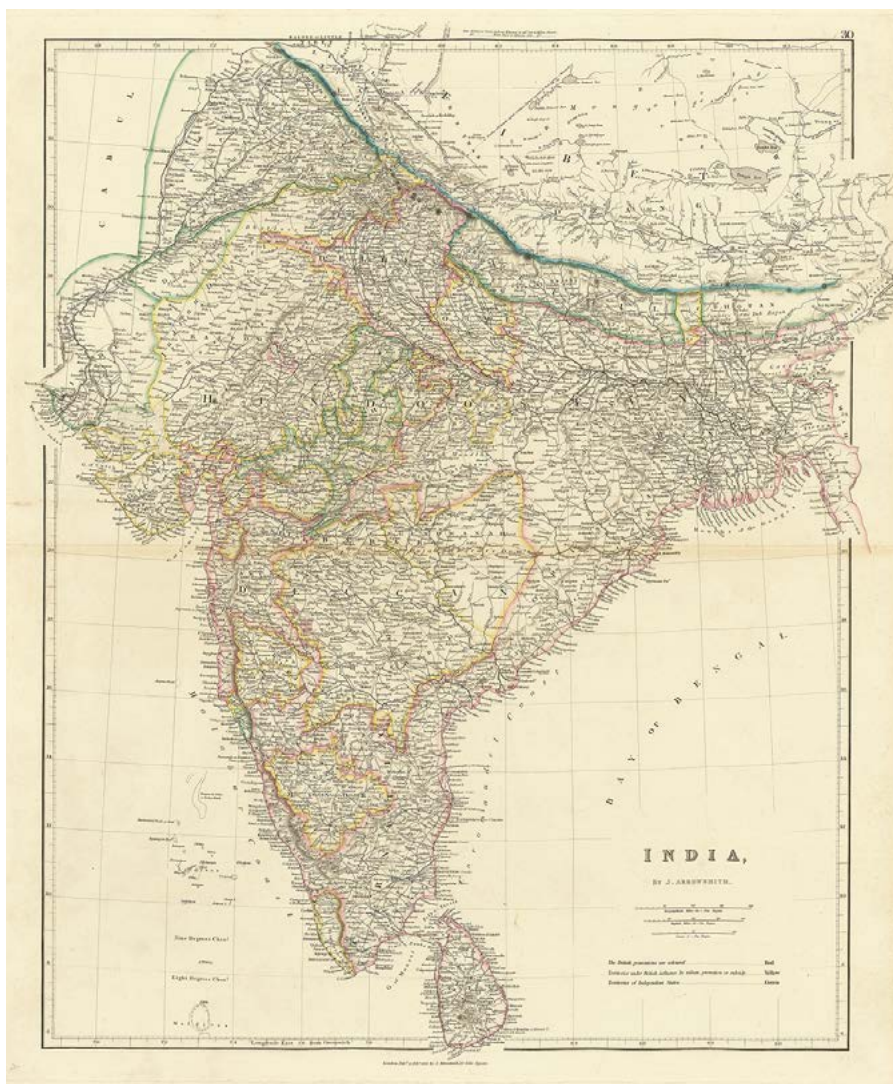
「极右派促成了某种双向的变动——极右派正常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主流激进化。这样的现象，反映着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趋势：边缘与中心、线上与线下、极端与温和之间的界线，正逐渐模糊。」

Damla Keşkekci

> 差异的对话： 本土思想与西方社会学

Rajesh Misra，印度勒克瑙大学

出处：John Arrowsmith，公共领域，来自
维基百科共享资源。



关于去殖民和本土社会学的讨论在1990年代获得了声量；然而，从一开始，印度的社会学就强调了本土概念和观点的重要性。这种重视可以追溯到两个脉络：首先是社会政治脉络，其次是学术意识形态脉络。

> 紮根于自由抗争与西方学术传统相互作用的社会学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印度的发展始于20世纪初，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经验同步。印度第一个社会学系成立于1919年，同年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在慕尼黑大学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创立了社会学系。然而，孟买大学 (University of Bom-

>>

bay)建立社会学系的计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4年就已制定。第一本印度社会学期刊《印度社会学家》(The Indian Sociologist)于1905年在伦敦创刊,由印度自由斗士 Shyamji Krishna Verma 创办,同年《社会学论文集》(Sociological Papers)发行,最终促成了1907年英国第一本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的诞生。另一本来自印度的期刊《印度社会学评论》(The Indian Sociological Review)于1920年代由一位来自巴罗达 (Baroda) 的英裔美国哲学家创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编辑的背景迥异。印度社会学的基础,标志着源自自由抗争的意识形态偏好,与西方学术传统不断扩大的影响之间,相互影响的动力。

尽管印度处于英国统治之下,并被强加外国信仰、课程纲要和教育系统,但1920年代的特点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包括反对英国统治的政治集体意识觉醒、反殖民独立运动、农民运动和工人罢工。这十年还见证了压迫性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和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的实施,以及像「哈里发运动」(Khilafat)、「不合作运动」(non-cooperation movement)等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会的建立。全印度工会大会 (All 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于1920年成立,随后印度共产党于1925年成立。随着自由运动在1920年代后期获得发展势头,它开始动员大规模群体并领导重大抗议活动。此外,代表「低种姓」的组织开始宣示其存在,批判「高种姓」的统治地位,并在马德拉斯立法委员会 (Madras Legislative Council) 中获得了一些保留席位。

所有这些动员、运动和组织主要由受欧洲传统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领导,但他们从本土遗产中汲取抵抗的活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则参与了与学术和知识追求有关的职业。在这种政治动盪的背景下,将本土观点融入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的努力都可以在学术层面上看到。

> 多元哲学的悠久历史

整个中世纪时期,印度哲学经历了显着的发展以及印度教和穆斯林思想的创造性融合,同时产生了虔信派 (Bhakti) 和苏菲派 (Sufi) 运动,朝向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地景。近年来,公共学者和名人将古老的见解与现有问题联系起来,提倡普世兄弟情谊和非暴力抗争等思想。印度哲学的多面性代表了多种元素的丰富交织,每个元素都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存在、社会和宇宙做出了贡献。这种遗产不仅反映了过去,也力求理解现在。它特别影响了印度社会学的发展,也更广泛地塑造了政治和思想。

> 「为了」印度的社会学或「代表」印度的社会学

在前述的两个脉络下,印度社会学一直参与围绕当时学术中心孟买 (Mumbai)、加尔各答 (Kolkata) 和勒克瑙 (Lucknow) 的本土化、脉络化和欧洲化讨论。最初,印度社会学在机构发展中处于次等的地位,与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和公民学相比,常被视为一个边缘学科。然而,孟买 (Mumbai)、勒克瑙和加尔各答

(Kolkata) 的社会学实践旨在建立独立的发展轨迹,采用扎根于印度现实的概念和视角,同时保留其独特的观点。

在这方面,可以识别出三种旨在将本土视角纳入更广泛社会学方法论的不同取径。第一种方法是传统主义的,完全拒绝西方社会学典范,主张印度社会的特质和不同的天性只能通过长期建立的古典哲学视角和采用本土概念来理解和描述,这些概念现在被称为印度 (印度教) 知识体系。第二种方法是严格社会学的,侧重于应用西方社会学框架和方法来概括和具体说明印度社会的特征。第三种观点旨在融合印度传统的动态特征与西方传统,承认西方社会理论和哲学实践的影响,同时整合印度哲学观点和印度社会的文化多样性。这可以从将吠陀哲学、诠释学和马克思辩证理论三者结合来解释印度传统理性的努力中来观察。

虽然第一种方法代表了一种封闭的独白,但第三种方法促进了本土视角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创造了一种全球对话。值得承认的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辩论在代表两种对立观点的印度社会学大佬之间展开:「为了印度的社会学」和「代表印度的社会学」。这场对话的焦点是社会学应该专注于印度社会的特定研究和解释,还是应该采取更广泛的视角,包括所有社会,而印度是其中之一。最近,有人呼吁进行一场关于后殖民的论述,这可能尚未实现。

> 本土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持续演进的对话

自独立以来,本土观点与欧洲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的整合在印度变得日益重要,这既承认了传统知识体系和文化实践,也欣赏了西方社会学方法在分析当代经济变革、政治转变和社会变革方面的有效性。西方社会学框架经常忽略印度特有的社会系统,因此强调了在后殖民的印度中将学术观点和学科去殖民的必要性,以促进学术的自主性。在此脉络下,印度社会学家的洞察强调了检视文化实践、多元性、农村社区、种姓结构、亲属关系、族群认同、种姓歧视、农业运动、社会行动主义、社会变革和经济成长的重要性。这在独立后的时期尤其如此,通过提出新颖的概念和模型,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视角来促进对印度社会的理解。

尽管印度教知识体系独特并与各种东方观点创造性地融合,但西方知识体系及其实际应用无疑具有吸引力。在此脉络下,西方社会学的主题、概念、方法和理论依然盛行,尽管有着强大的本土化和情境化传统。可以说,本土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对话一直在进行,反映了该学科的进步。

此外,全球化脉络下的本土化进程正在演变,新兴的研究领域,如达利特 (贱民) 研究、部落研究和性别研究,都以底层和批判理论方法为框架。印度社会学家透过提供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时的本土见解,为全球社会学做出了贡献。尽管社会学传统上是一门主要在西方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典范影响的社会科学,但断言印度社会学在其整个历史中,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独立后,都被西方框架决定性地主导是具有误导性的。

从社会学诞生以来，就一直有认同本土观点和思想重要性的倡议。这一点从各种著作中呈现的多元观点中可见一斑，这些作品有的稳固地建立在印度知识传统的基础上，有的在扎根于印度脉络的同时也受到西方社会学概念的影响。尽管在将传统价值与当代实践和本土观点以及全球化影响相结合的方面上一直存在许多困难，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于加强本土社会学和将本土洞察纳入全球社会学至关重要。■

来信寄至：
Rajesh Misra <rajeshsocio@gmail.com>

> 印度社会学的日常实践： 回顾去殖民

Maitrayee Chaudhuri，印度社会学协会主席，印度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

在印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尽管关系密切却充满争议，它们的发展始于印度仍是英国殖民地的时期。因此，殖民主义与印度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必然是深刻而复杂的。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的学术研究关于[学科历史](#)以及反殖民思想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印度社会学内部，关于外来概念的限制和对本土性的追求，却有着更悠久的辩论历史，这一点从对《社会学报》、《印度社会学贡献》中辩论的粗略审视即可见一斑。

在全球范围内，关于去殖民的讨论一直很热烈；矛盾的是，这对印度这样一个曾经的殖民国家来说，却是相对较新的舶来品。这些发展引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印度社会学界内部的追求，能否以该术语目前的用法，被解读为「去殖民」？而长期坚持抵抗学术殖民主义的追求，是否意味着印度社会学家们在批判西方范畴的意义上达成了共识？

后者的答案，或许并非如此。许多早期的印度社会学家都共同关注民族建构、社会改革，以及科学的重要性。然而，另一种一直存在但长期被压抑的学术思潮，是提倡印度独特的文化，要求其自有的分析范畴。即使在这种主张内部，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然而，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 (Hindutva) 的兴起，主导性的印度知识体系 (IKS) 理念才获得了权力和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伴随着对去殖民概念的挪用，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读去殖民？

> 作为「行动」的去殖民

关于去殖民的著作指出，去殖民并非单一事件；它更多关乎于「行动」，更应被理解为一个动词，因此是一个过程。在读到西方国家在课堂和课纲中去殖民所做的努力的后，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教学参与。这让我思考，去殖民是否是一个我可以在回顾中添加的术语。我借鉴了两组经验：在印度教授性别课程和撰写女性主义文章；以及在印度教授社会变革概念的课程。为了进

「去殖民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对话的语言」

一步补充脉络，我于1970年代末进入大学学习，并于1980年代末开始在印度任教。

> 教授性别，承认女性主义

全球北方在我们日常的本土学术界中一直普遍存在。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课程中是如此庞大。在1990年代初期教授一门关于妇女与社会的课程时，我对于必须从西方教科书中强制引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理论感到不安。对我来说，从历史开始更有意义。然而，只是在回顾中，我才明白为何历史化如此重要；因为当时可用的理论框架没有不同历史的空间。关于多元现代性的热潮尚未传到我们的海岸，地区化欧洲 (provincializing Europe) 也未曾发生。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尚未成为全球北方国际化课程的附加项目。我们仍在挣扎，缺乏言语来证明我们的全球历史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的。因此，我们的现代性是不同的，正如我们的女性主义历史也是如此。

当我努力撰写一份关于印度女性主义的概念性论述时，我经历了一个从日常挑战中学习的过程。首先是认为女性主义在印度没有被讨论的信念。回顾起来，我明白这意味着我们没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那样的辩论。其次，我意识到一个显而易见但却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对于西方女性主义者而言，是否参与非西方女性主义是一个他们可以选择的选项，但对于非西方女性主义者或反女性主义者来说，却没有这样明确的选择。对我们而言，我们进入现代性的过程本身就是透过殖民主义来调节的，正如民族主义或民主、自由市场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等一整套思想和制度一样。

第三，是意识到知识流通的脉络已经改变。在殖民主义和反殖民抗争期间，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影响的性质是直接的政治性，与社会运动相关联——无论是中产阶级或反种姓社会改革者、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阿迪瓦西人（Adivasis）。他们力图创造历史，致力于阐明一种独特的身份。对于妇女运动中的人来说，这通常表现为一种否认。「我不是女性主义者」这句话，经常从重要的公众人物女性口中听到，这引发了我们是否应该依据自我定义，还是依据她们在社会中的行动和后果来评估的问题。

第四，因此，认识到女性主义正在被讨论，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往往发生在一个脉络中，这个脉络既缺乏差异的论述语言，也没有给予这种差异表达应有的政治合法性。诸如「性别建构」、「展演性」、「父权制」和「交织性」等概念，一个世纪前以不同的名称存在。直到回顾时，大多数印度女性主义者才意识到她们是[交织性分析师](#)。

> 教导印度社会变革的概念

长久以来，印度社会学一直处于不断追赶的状态，紧跟着[西方生产的概念](#)。因此，即使现代化框架主导印度社会学数十年，发展被视为本土产生的概念，这样的渴望依然强烈。我想起在许多研讨会上，梵文化（Sanskritization）会被标榜为原创概念的一个例子；而女性主义和反种姓的质疑，就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被视为学术社会学领域之外。

在我的社会学课堂上，我们学习了现代化，它是指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向西欧和北美发展并将在全球传播的类型转变的过程。我们也读到那里存在着文化失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将发展出与经济更进步的国家相媲美的制度，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全球一致性。殖民主义则被轻描淡写地带过。这在一个我们从小就学习 Dadabhai Naoraji (1825-1917) 和他的著作《印度的贫困与非英国统治》的国家来说，是多么奇怪，这本书早期批判了不平衡发展和印度的「财富流失」理论。因此，即使引进了依赖理论和 André Gunder Frank 的理论，它们也只是作为印度社会学模板的结构功能主义框架的附加项目。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启示是「传统结构和文化特征」与「发展」之间的兼容性／不兼容性。现代印度史学家指出，虽然西方的现代化导致了城市化，但在印度，来自英国的制造产品充斥市场，导致手工织布业的毁灭，织工们随后涌入乡下和农业地区，陷入贫困。其中一些人成为契约劳工，在加勒比海或英属、荷属和法属盖亚那等遥远地区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工作。当我开始在印度教授现代化时，我必须摆脱对文化失调的探问，把故事弄得更复杂；并处理我们从殖民主义中遇见现代性的历史特殊性。人们必须从抽象理论转向历史，这与我女性主义的经验非常相似。

> 结语

只有在回顾时，我才明白为何诉诸历史细节对我们如此重要，以及为何全球南方的「行动历史」就是「理论的历史」。我们的故事并不存在于现有的理论框架中，因为反殖民运动和思想在主流社会学中一直被隐藏。尽管对流行语和挪用的危险保持警惕，但去殖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发声的语言。■

来信寄至：
Maitrayee Chaudhuri <maitrayeec@gmail.com>

> 南印度的社会学

Indira Ramarao，印度社会学学会前会长，印度迈索尔大学

南印度社会学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零年代。以下将南印度社会学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段：1900-1950、1950-2000 以及 2000-2024（截至本文撰写时）。所涵盖的地区为印度的五个行政区：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克拉拉邦（Kerala）、坦米尔纳都邦（Tamil Nadu）以及联邦属地朋迪治里（the union territory of Puducherry）。

> 1900-1950

早在 1915 年剑桥经济学家 Gilbert Slater 受聘担任马德拉斯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之时，以社会学视角来理解社会现象的需求开始萌芽。Slater 认为，只有让印度学生理解社会的本质，尤其是对印度农村社会有所认识，对他们的经济学教学才算是完整的。他对印度村落的研究，以《南印度若干村落》（Some South Indian Villages）为名于 1918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这为我们今天所颂扬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或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研究奠定了基础。

类似的尝试也可于 1917 年，当 A.R. Wadia 从孟买威尔逊学院前往玛哈拉贾学院哲学系出任系主任之时。Wadia 热衷于达到一种哲学的社会学导向，这个想法获得 Brajendra Nath Seal 院长的支持，促使社会学成为社会哲学本科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Wadia 促进社会学研究的决定也在 1928 年成功促成了印度首个社会学本科课程的设立。南印度社会学历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是在 1949 年一年制社会学硕士课程的设立。

在海得拉巴奥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本科课程设置于经济学系，在 1937-38 学年度才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而随着 1946 年研究所课程的设立，社会学才正式成立为一个系所。到了 1956 年印度依语言划分各邦之际，南印度也仅有迈索尔大学以及奥斯马尼亚大学开设硕士课程。

在克拉拉邦，社会学作为一个辅修课程开始于 1930 年代；它在各个学院中开设，授课对象主要是经济学系、历史学系以及政治科学系的学生。同时也应注意，这些相关机构皆为马德拉斯大学的附属学院。

在研究领域方面，我希望特别提提奥地利民族学家 Christoph von Furer-Haimendorf 所从事的研究，他在 1945 年受聘为奥斯马尼亚大学的荣誉教授以及尼扎姆政府的顾问。他的到来不仅促成了奥斯马尼亚大学开

设社会学研究所课程，也带动了该邦广大部落地区的研究工作。von Furer-haimendorf 最为人称道的一些田野调查便是在真丘（Chenchu）、比尔（Bhil）以及拉杰冈德（Raj Gond）等部落社群中进行的。

> 1950-2000

有鑑于院系数量和研究活动方面的增长，这是南印度社会学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段。社会学的教学兴盛于各个大学乃至学院之中。大学院系主要提供硕士课程和研究计画，而学院则提供社会学本科课程。

在 1950 年至 2000 年之间，卡纳塔卡邦就有六所大学开设社会学硕士课程，而这些大学皆有附属的学院来提供社会学本科课程。1970 年，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简称 ICSSR）在卡纳塔卡邦的班加罗尔（Bengaluru）建立了其首要院所：社会变迁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在尚未分治的安得拉邦，多达七所大学设立社会学研究所课程，而坦米尔纳都邦则有十个院所开设此类课程，其中八所在大学、一所在私立学院、一所在研究机构。而朋迪治里中央大学的社会学系于 1993 年正式成立。

克拉拉邦呈现出一种特殊情况：社会学研究所课程最初设立于学院之中，直到 1969 年才首次进入大学体系。需要留意的是提供社会学研究所课程的学院竟发展出一种研究的文化，一般被认为是研究所才具有的特点。一个特出的例子是提鲁沃嫩塔布勒姆（Thiruvananthapuram）罗耀拉学院的 Joseph Puthenkalam 所写的专著《克拉拉的婚姻与家庭研究》（Marriage and Family in Kerala），被认为是克拉拉邦亲属制度的奠基性作品。

1950 年代初，南印度各个大专院校的社会学系对印度社会展开了开创性的研究。开创了印度村落专着研究风潮的 Shyamacharan Dube，以社会学系副教授（Reader）之职加入奥斯马尼亚大学。Dube 以邻近塞康德拉巴德市（Secunderabad）的沙弥尔佩特（Shamirpet）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开创性着作《印度村落》（Indian Village）出版于 1955 年，被认为是[南亚第一部聚焦于一个村落的着作](#)。到了 1954 年，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美国人类学家 Milton Singer 受政府邀请来研究马德拉斯邦当时的农村社会变迁。他针对传

>>

「南方的社会学系 开展了对于 印度社会的开拓性研究」

统因素对马德拉斯这座工业化城市的影响，以及梵语传统在现代都市中心的地位所进行的研究，促成了1955年《一个伟大传统的现代化：从人类学视角看印度传统》（When a Great Tradition Modernize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Indian Tradition）这部经典之作的出版。而 M.N. Srinivas 的《迈索尔的婚姻与家庭研究》（Marriage and Family in Mysore）以及《南印度克格人的宗教与社会》（Religion and Society among the Coorgs of South India）两本著作，则先后在1942年及1952年出版，这期间他正任职于孟买大学社会学系。

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卡纳塔克邦的社会学系也成为承接研究社会问题计画的重要基地，这些计划由中央政府与各邦机构所资助。这些计划主要专注于情势分析与政策建议上。C. Parvathamma 关于农村贫困人口、指定种姓与指定部族之住房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学系所倡导的「为社会行动而研究」之理念的若干典范之一。

1950-2000年间，南印度社会学领域无论在大学数量还是教学课程上都达到最高速的成长。然而自2000年起，随着高等教育的主导权从公立转向私立，社会学的发展遂遭受冲击。

> 2000-2024

综观南印度地区，虽然二十一世纪以来成立了许多新大学，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私立机构。即便是在新设的公立大学中，社会学的发展也呈现下滑趋势。卡纳塔卡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此期间，政府创办了三十七所大学，但其中仅有九所设有社会学系。在2000到2023年间，则有三十九所私立大学创立，然而其中只有两所大学提供社会学课程。与此同时，安得拉邦与于2014年自其分离出来的特伦甘纳邦（Telangana）分别设立了四十九所以及二十八所院校，但其中只有三所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在坦米尔纳都邦二十九所新设的私立大学中则无一提供社会学课程。同样地在克拉拉邦，没有任何社会学课程在2000年以后开设的私立大学中提供。然而，稍具安慰的是，学院至少还开设社会学课程。

南印度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引发了许多需要严肃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该学科在南印度不同地区历史纪录上的空白。我们既缺乏对社会学发展模式的系统性纪录，也尚未深入探讨造成其走向衰退的原因。至于辨识各大学社会学系曾涉猎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检视，在我看来也是一片巨大的空白。许多系所毫无疑问曾有过开创性的研究，但关于这些研究的纪录、其当下的意义以及是否曾以此为基础进行长期追踪研究，几乎完全付之阙如。尽管不可否认博士研究具有一定的就业导向价值，但多数研究仍流于以学位为目的，缺乏严肃的学术检讨。此外，关于教学实践与品质评估的问题，也极需要展开一番严肃的探讨。■

来信寄至：
Indira Ramarao <ramaraoindira@gmail.com>

> 印度社会学中的女性：

女性主义贡献、教育学与实践

Arvinder Ansari, Jamia Millia Islamia University, 印度

印度社会学的发展深受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影响。上述的历史进程，经常与父权体制、婆罗门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持有一致的观点，也因此更倾向于特定的知识生产方式，并经常边缘化其他知识形式。在这些占据主导位置的知识结构中，女性更常被视为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知识生产者或理论家。只有在分析家庭、亲属关系、再生产与社会角色时，女性才会进入社会学的视野，他们在现实中的生活经验，则被化约为了社会学论述中的分析资料。于此同时，女性社会学家的学术贡献，则隐身于社会学的学科历史中：他们在大学课程中被边缘化，且未能于学术机构中取得足够的代表性、应有的肯认与地位。这种边缘化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印度的社会学领域，仍然存在着很深的结构问题，使得女性在知识体系中遭受排除。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相关学科的历史，并作为女性主义者采取行动、确保女性在这些领域中的重要贡献能够受到重视。

在这篇文章中，我简述了女性主义对印度社会学的贡献，并试图呈现女性社会学家如何促使这个学科的变革发生。我检视了女性如何参与在教育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学术机构的领导等面向中，以及他们如何挑战了性别主义传统与主流社会学典范。本文讨论了 Neera Desai、Vina Mazumdar、Maithreyi Krishnaraj、Sujata Patel、Maitrayee Chaudhuri 和 Sharmila Rege 等人的提出的思想，如何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和制度阶层。这些学者主张，应透过女性主义重新想像社会学，并在方法论中纳入反身性、知识多元性与交织性。我认为，女性不仅辅助了社会学的发展，更提供这整个学科得以持续革新的重要基础。

> 针对男性中心知识论的前沿批判，
揭露了女性遭受的系统性边缘化

女性主义者刚现身于社会学领域中时，便批判了印度社会学早期的知识论焦点。在印度社会学刚发展起来时，学者们聚焦于乡村研究、种姓阶级制度、亲属关系模式和社会结构等主题，然而这些研究经常忽略女性的经验，并将性别分析排除在概念框架之外。女性主义学者让性别成为了社会学分析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并挑战了社会学家的上述局限，改变了整个学科的关注焦点、促使人们重新想像一个研究应该如何进行。

在印度最早的一批女性主义先驱中，Irawati Karve 针对亲族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创新研究](#)，结合了人类学的敏感度与严谨的社会理论基础，更细致、包容地呈现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再加上印度女性地位委员会于1974年发表的「迈向平等」报告，以及女性运动的激励，学者们在1970和1980年代率先制度化了女性研究，为女性主义学术开闢了空间，促进了针对男性中心知识论，以及女性在社会学界被系统性边缘化的批判。

> 将女性主义观点融入教学与研究

印度的女性主义学者挑战了主流的知识论，并推动以生活经验、反身性和交织性为基础的教育学，并借此重塑了社会学研究。Maithreyi Krishnaraj 在 SNDT 女子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的贡献，对于将女性主义观点融入教学与研究极为关键。他提出的参与式学习方法，强调学生与社区之间的合作，鼓励知识的共同生产。Vina Mazumdar 则是女性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他在行动和学术之间架起桥梁，带头开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教育和研究活动。这些活动赋予了边缘女性权力，并将其经验视为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核心基础之一。1974年，Neera Desai 在 SNDT 女子大学成立了印度第一个独立的女性研究中心，进一步将[女性主义教育制度化](#)，维系着女性主义学术与行动之间的连结。

浦那大学 Kranti Jyoti Savitribai Phule 女性研究中心主任 Sharmila Rege 则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教育学](#)，将种姓、阶级和性别的交织纳入视野。借由 Dalit 女性的叙事与证言，他对女性主义理论和教育学带来了激进的冲击，不仅扩展了方法论的视野，更挑战了主流社会学和上层种姓女性主义论述的排他方法。

Sujata Patel 和 Maitrayee Chaudhuri 对女性主义教育学的贡献极为重要，尤其是强调了反身性是方法论和伦理的必要条件。Chaudhuri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The Practice of Sociology](#)》中，提倡在课堂空间中促进自我反思，并挑战根深蒂固的知识阶层制度。他主张方法论的多元性，并鼓励学生运用他们的生活经验，作为重要的知识来源。Patel 同样聚焦于反身性、跨学科和转化式学习。他指出印度社会学中带有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遗绪，批判了欧洲中心框架的主导地位，并呼吁社会学应以[边缘化群体的观点](#)为核心。Patel

>>

的女性主义教育学，提倡[打破知识的阶级制](#)，以促进更具包容性和社会参与的知识生产模式。

> 处境知识与交织性

Donna Haraway的「处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概念，批判了科学中虚假的客观性主张，并提倡了以生活经验和特定社会位置为基础的知识论。在印度，[Sharmila Rege](#)借由针对 Dalit 女性的研究，实践了这个理论，推动了以Dalit女性主义为立足点的知识论，挑战主流社会学与上层种姓女性主义论述，坚持将种姓、阶级与性别视为压迫的共构结构。

[交织性](#)这个由 Kimberlé Crenshaw 首次提出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印度女性主义社会学中的关键分析与方法论框架。Sujata Patel 和 Mary E. John 扩展其应用范围，以解决印度脉络中的种姓、阶级、性别、宗教和地域性的特定交织问题。Patel 批判了印度社会学的殖民与婆罗门基础，将交织研究法试图瓦解的排除实践清楚呈现。[Mary E. John](#) 则运用交织性的分析方法，检视父权制度、种姓制度、公社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共同作用，并呼吁女性主义政治意识到这些复杂的权力结构。

> 在社会世界中定位女性主义理论

Gail Omvedt 和 Kamla Bhasin [将女性主义的实践扩展到学术界之外](#)，把女性主义的方法带入草根运动和社区的学习空间。Omvedt 将女性主义理论与 Dalit 和乡村女性运动结合，强调参与式学习与集体赋权，模糊了学者与倡议者之间的界线。他在针对参与式行动的研究中，将边缘社群定位为共同研究者，打破了知识生产中的传统阶级制。Kamla Bhasin 透过与 Sangat 合作的女性主义教育计画，以及他平易近人的著作，如《[What is Patriarchy?](#)》与《[Understanding Gender](#)》，将女性主义知识传播给一般大众。借由说故事、唱歌和对话，Bhasin 促进了乡村女性和劳动阶级女性的集体学习和意识提升，使女性主义理论得以普及草根。

总结来说，这些女性主义方法论将纳入了参与性、包容性和道德的研究实践置于优先。他们挑战实证主义与抽离式的调查形式，提倡反身性、处境知识与交织性。正如 Gita Chadha 和 [Maitrayee Chaudhuri](#) 所强调的，反身性要求研究者批判性地检视自身地位，与知识生产中固有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学者由 Pierre Bourdieu的反身性社会学出发，提倡更深入的自我反省，将研究者置于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中，并破除了客观中立的主张。这些方法强调对知识生产去殖民化的承诺，并促进了连结学术与社会转型的实践。

> 针对女性的暴力与歧视仍然持续

然而，尽管上述贡献影响深远，印度的学术界仍正奋力对抗者男性主义的制度文化，这些文化往往使女性的学术工作变得无足轻重。Chaudhari认为，性别阶层制度仍然存在，其不只影响学术还境中的职业位置，更延伸至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女性的研究，尤其是涉及

「女性的贡献 是该学科的基础」

女性主义理论、种姓与边缘性的研究，经常被低估，或被限制于「女性研究」领域中，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学论述。[Maitrayee Chaudhuri](#) [批判了这种知识上的排除](#)，她认为女性主义的见解往往被视为补充，而不是学科分析框架的核心。

现在的印度女性主义社会学，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技术变迁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复杂的挑战。零工经济与平台式劳动的扩张，使得女性的工作不稳定更加严重，对 Dalit、Adivasi 与少数民族女性造成极大影响，他们面临不安全的生活、薪资差异，并受到社会保护系统排斥。以上述社会变迁为前提，数位使用可及性的差异，更加强了现有的种姓、阶级和性别阶层，使平等的经济机会受限。与此同时，都市规划与基础建设的发展，往往让佔优势的族群享有特权，让边缘女性难以使用安全且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

Bina Agarwal 和 Vandana Shiva 等学者，都强调了环境退化和气候导致的流离问题如何进一步使人们的处境更加危急，尤其对乡村和原住民女性而言，他们的劳动是社区生存和生态永续的重要根基。此外，基本教义派、族群冲突与政治两极化的盛行，也使得针对宗教少数民族女性的暴力与歧视，损害其权利与安危。这些相互交织的困境，让我们更加需要透过具有反身性、交织性，并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女性主义实践，于不断演变的世界秩序中，应对当地与全球的不平等结构。

> 拥抱多元性、提倡社会参与的学术环境， 迎向包容且具反身性的学科

女性主义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重构了印度的社会学、挑战其男性主义的根基，也扩展了社会学的方法论、取径与关注焦点。虽然不平等仍然以不同形式演变且持续存在，女性主义研究者至今以来的贡献与行动，已经确保女性得以在重要学术机构——尤其是印度社会学学会——中有更大的空间甚至担任领导者。

近年来，印度社会学的发展显示出具意义的制度进展，以及对包容性的重新承诺。2016年，Sujata Patel 成为印度社会学学会首位女性会长，标志着学术性别平等议程的重要里程碑。在任期内，他也为后续的女性领导者——例如 Indira、Abha Chauhan 与 Maitrayee Chaudhuri 教授——铺展了道路，他们在担任会长的期间，持续巩固上述议程，更促进了印度社会学学会的民主化进程，推动结构不平等与促进包容性学术研究等目标。

透过对教育学、研究与制度实践的批判性介入，女性主义学者突显了反身性、交织性与以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参与式方法论的重要性。女性领导者在印度社会学会中的贡献，进一步让这些变革能够开花结果。然而，印度社会学的民主化仍未完全实现——要建立一个真正具包容性与反身性的学科，需要各种性别身分的学者积极参与。

接下来的目标，并不是要创造排除男性的女性主义空间，而是培养能让多元的声音协力合作的平台，以更全面、更平等地理解印度社会。鼓励男性学者深入女性主义视角，有助于拆解根深蒂固的阶层体制，让这个学科变得更加丰富。借由拥抱多元、推动具社会参与性质的学术实践，印度社会学得以迈向一个将女性主义思想与实践，置于其知识与制度核心的未来。■

来信寄至：
Arvinder Ansari <arvinder2009@gmail.com>

> 身在印度的 社會運動研究反思

Shruti Tambe, Savitribai Phule Pune University, 印度

—— 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运动社会学这个领域，逐渐在西方发展起来。20世纪60年代，这个次领域在广泛流行于全球各地的社会学界，包括印度。说起来，社会运动社会学的发展，正好对上了世界各地的去殖民化时期。反殖民运动的蓬勃，与社会运动社会学的兴起同时发生，这难道只是碰巧吗？

我认为，社会运动社会学这个独立的学术领域，正是由各式各样的抗议活动，以及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种族运动所促成的。可以说，社会运动社会学超越了过往的学术传统，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社会的变迁如何发生。可惜的是，当时的学者们，并没有将去殖民化时期实际存在的那些方法、策略与意识形态，也一起涵盖到这个领域的讨论中。这造就的是，社会运动社会学这个学术领域，似乎完全是独立于「殖民世界」的发展之外的。

>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 现代无产阶级运动

有鉴于社会运动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我想在此提出三个对这个领域来说极为关键的假设。这三个假设，将协助我们进一步构建此领域中的学术研究触及特定经验的正当性。

首先，是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这个论述。现代性的所有元素，包含思想、价值观、政体、经济、社会与技术的变迁，皆促使社会运动成为一种彻底的现代现象。即便这些变迁的发生起初非常缓慢，并且有明显的地域性，但自15世纪以来，我们能够在欧洲的各个地区，普遍地观察到特定的智识发展过程。不管是个人主义、理性化，还是创新美学的推广、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崇，皆普遍存在于现代世界当中。这些变迁同时也促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在殖民世界中，情况也是如此吗？在当时的南半球，种族议题是重要的吗？

其次，在这个领域中，针对制度化集体行动的研究，是根植于现代性、个人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所形塑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歧见等面向当中

「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同质的类别」

的。这为西方独有的这些经验，赋予了真实性。亦即，这些制度化的行动，与20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之下的民主制度结构有关。

第三个假设，则是关于是谁领导了这些抗争、谁又是被领导的人。在社会运动这个领域中，有一个明确的预设是，无产阶级是社会运动的先锋。抗争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主社会中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压力。

借由上述假设，以及其余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观点，全球学者对社会运动进行了研究，并凸显了结构紧张、歧视、失去生计和民主异议等议题。延续这样的视角，在印度甚至全球南方的社会运动中被采用的各种策略，得以被记录下来。

> 在印度流行了六十年，但仍不属于主流

在1980年代的印度，与社会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和部落运动相关的研究数量急剧增加；像 Bhoodan-Gramdan 运动这类涉及土地和村庄赠予的个案研究，则借由社会运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记录并分析了各种抗争与运动。同个时期，有数篇来自不同大学的相关博士论文发表。

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领域，社会运动社会学已经流行于国际社会学界六十年之久。在南亚、尤其是印度，更有数以百万的、没有资源的普通民众，参与了各种抗议、社运活动。然而，这些经验却尴尬地挣扎于主流社会学的社会运动论述当中。我们能否理解这个长久以来的困境，并找出指引前路的曙光？

> 印度的社会运动浪潮未能聚焦社会学辩论

[NAPM@30](#) 是一份歌颂抗争（无论成功或失败）的文件，其指出1990年代初人民联盟崛起时，世界银行就已经将结构调整计划强加于印度政府之上。这严重影响了补助金、福利计划、补贴以及成千上万个长期工作的稳定。然而，正如 [NAPM@30](#)所述，针对福利国家的承诺，以及盛行至1980年代末的、基于宪法价值的制度结构，统治阶级与那些没有资源的、受到剥削的民众之间，大致上达成了一个模糊的共识。

20世纪70和80年代，印度各地掀起了一股由学生和青年领导的运动浪潮，他们希望能借由社会运动，推动印度社会的社经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援引了反殖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宪法中所提及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等主张。其中的诉求包括：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者、为那些在社会和经济上被剥削的群体提供居住、给予贫困学生教育津贴、建立粮食的公共分配粮制度……等等。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仍然相信，经过四十年的后殖民时代，印度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正义、世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支持下，沿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道路前进，为数十亿人打造公平的未来。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成千上万的抗争与运动在印度各地此起彼落。即便如此，社会运动在印度社会学界，仅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但并非是人们关注的核心议题。印度社会学界的主要论辩，仍是关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以及社会阶层的概念性与物质性。

> 「新」抗争反映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与殖民资本主义印度经济之间的差距

大约在1980年代末期，新社会运动理论（New Social Movement, NSM）出现了，它以自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已发展世界出现的「新」运动为分析焦点，对应着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旧」运动。「新」社会运动的特性，是其更加关注先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私人生活与符号领域的变迁。

当时，许多群众运动——包括青年为就业、农夫为公平价格和土地权利、部落社区为反对流离和要求资源而发起的抗争——正于印度的民主舞台上引起一股浪潮。政治和经济改革等议题浮上台面，透过收入和权力再分配来减轻贫穷现象，更成为公民社会的讨论焦点。在1980年代，关于生存，以及人们如何借由运动及工会争取尊严，并拥有这样的民主权利，是很普遍的议题。

换句话说，在印度社会运动涉及了物质冲突、公民权和人类尊严，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如何生存

的问题，或多或少已经解决了，引发冲突的议题，更像是身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印度透过殖民资本主义这项途径，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正如 Alavi 与 Shanin (1982) 所强调的，这解释了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与殖民资本主义印度经济之间的差距。

> 被忽视的概念与理论架构

在研究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时，学者们原封不动地套用了 NSM 的理论框架。其中包括被剥削的社会文化阶层——独立后被国家标籤为「在册种姓」(scheduled castes)——运动、部落要求林地和相关产品的文化权利与公民尊严的运动，以及妇女运动。

迎来新的千禧年，许多尚未达成目标的抗争活动，仍持续努力争取物质与社会文化权利，与此同时，研究者们正使用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理论——从相对匮乏的功能主义解释到 NSM——来分析这些活动。

尴尬的是，一些资深的研究者，几乎是语带歉意地指出，1980年代印度学者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与理论架构，可以说大多都在印度学术界遭受了忽视。一些社运人士则表示，除了少数学者之外，运动的口号、议程，以及如何实际运用特定策略，都未能在学术界引发多少讨论。

> 总结全球南方的问题

如今，不同意识形态与议程之间的论辩、抗争与多元意见，让民主能够以各种形式展现于当代世界。然而，如果仔细看看全球南方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真的和他们身在同一个星球上吗？许多深入的分析显示，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同质的范畴。从自然资源分配冲突，到 #MeToo 等反性侵运动，从 LGBTQ 族群等身份认同运动到抗议资本主义开采、工业与基础建设计划造成的迁移，有些问题是全世界共有的，有些则是全球南方特有的。在这些条件下，资源、收入、权利与有罪不罚等议题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复杂的全球情景。

总结来说，我提出以下问题：印度的社会运动社会学，是否未能由反殖民抗争的不同策略——从与英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到甘地领导下的非暴力社群网路——当中，获得其概念和理论基础？西方的社会运动社会学理论，将民族主义理解为某种狭隘的意识形态，然而，在甘地领导下的民族主义，难道也是如此吗？如果说真理与道德是以非暴力为根基，我们原本应该可以将印度视为在全球南方出现的、新的现代性型态的案例，并进一步探究人道

主义价值观如何成为更具国际视野的、新民主国家的基础。既然这样，那我们过去在分析印度和其他南半球社会的抗争和冲突时，是不是太过机械式地套用了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无意识地接受了东方主义的预设？

社会运动社会学如今急需新的生机，因此，我们必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正的、能够适用于不同的社会运动现实的次领域。对于身在全球南方的我们来说又更是如此。■

来信寄至：Shruti Tambe <shruti.tambe@gmail.com>

> 极右势力的正常化与激进化的主流

Sabrina Zajak, DeZIM Institute, 德国; Emanuele Toscano, Guglielmo Marconi University, 义大利, 和 Anna-Maria Meuth, DeZIM Institute, 德国



图片来源: Sebastian Christoph Gollnow
经 AI 编辑。

全球许多民主国家正在经历其原有原则与核心价值的巨大变动：过去被标籤为极右的势力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存在，反而成为新的常态、主流思想。族群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反移民、性别歧视及反多元的意识形态，已佔据社会中的关键位置。极右势力不仅坐拥经济与政治菁英的位置，亦透过基层运动与社群媒体意见领袖进行动员。多年来的主流化与动员，已使极右意识形态在社会各领域取得实权，深植于许多普通男女老幼的心中，使社会逐渐转变成我们称之为「激进化的主流」。

> 激进化主流的概念

在本期《全球对话》特刊中，我们希望聚焦于极右势力正常化的最新动态及其对欧洲、美国乃至全球自由主体系联盟架构的影响。我们将探讨那些过去被边缘化的族群民族主义观念与言论，如何逐渐被主流话语、社会文化层面、个人态度以及政治动员与政策所采纳并公开表达；并分析这一现象的形成过程。我们建议采用「激进化主流」的概念，将焦点从单纯分析极右的战术、行动者与意识形态，转向理解主流本身如何被激进化。

我们所称的激进化主流，是指透过一个日益密集的本土至全球网路（包括政治人物、商业领袖、数位法西斯、政党、组织、基层运动以及个人）扩散与拼凑各种意识形态，并透过不平等价值秩序重构社会与社会关系。借此概念，我们也希望引起更多关注一个相互关联但迄今仍大多被忽视的过程：民主与包容性规范和原则的去正常化，以及亲民主、反歧视（如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和进步力量被边缘化的现象。

在本篇导言中，我们希望进一步阐释「激进化主流」的概念，并指出其在国际层面的部分影响，以及对平等与自由多元民主所带来的（预期）后果。

> 从探索到分析

当我们首次于2023年于德国柏林由国际社会学协会 (ISA) 与德国融合与移民研究中心 (DeZIM) 共同主办的国际会议上提出「激进化主流」的概念时，我们想聚焦于一个矛盾现象。对我们而言，「激进化主流」这一概念更像是一种修辞手法与引人深思的矛盾语，因为激进与主流本是对立，或至少是无法分割的两个概念：激进的东西不可能同时成为主流。我们将该次会议命名为「寻找激进化主流」，作为与国际知名学者讨论正常化动态及其潜在危险的平台，特别是在（主流）社会逐渐激进化的情况下。

如今，我们认为不再是寻找的阶段，而是该深入观察日益激进化社会的实际现况，以及极右势力的正常化与民主、多元与进步行动者及价值去正常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期刊载的各篇文章提供了广泛的实证证据。

Terry Givens 透过比较欧洲不同阶段的政党体系，探讨极右势力的正常化现象。Damla Keşkekci 则论述平台主流化的不同机制。与此同时，Pasha Dashtgard 研究了「男性圈」(manosphere) 如何将男性自我提升的网路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战场，展示了身体与阳刚气概的优化如何成为激进化的机制。受到更广泛文化转向的推动，极右行动者也日益利用时尚作为策略工具，以建构身份、传播意识形态，并在主流文化表面下正常化极端叙事。Andrea Grippo 展示了跨世代的

极右美学策略如何演变——从明显的次文化风格到讽刺且过度正常化的时尚——将美学武器化，作为政治渗透与文化合法化的载体。最后，Sumrin Kalia 揭示了极右势力如何透过多种机制侵蚀巴基斯坦及其他地区的公民社会，而 Roberto Scaramuzzino 与 Cecilia Santilli 则分析了民粹治理重塑公民社会的多样方式。

> 聚焦于话语转变

那么，这里与现有关于极右及极右动员的研究有何不同呢？

大量研究与文章聚焦于支持极右政党的选民（多为男性，涵盖各个社会阶层）以及其崛起原因，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这些原因包括应对快速现代化的经验、社会不平等、不安全感、政治环境与代表制度的变化、多重危机、战争及疫情等因素。另有研究则聚焦于社会层面，探讨极右崛起作为社会动员的结果。

正常化观点探讨族群民族主义者与意识形态如何被社会主流所采纳，并在政治、文化及话语层面扩散。理解与描述政治议程向右转变及其对民主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此观点的核心焦点。许多专家与学者强调，对民主制度与价值的攻击，往往是从民主体制内部进行，并劫持其制度与价值。

分析重点在于话语的转变：正常化可以透过去由右翼行动者使用，且如今已进入主流话语并被视为常态的词汇来追踪。此过程可能导致政治辩论与文化的转型，以及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社群媒体平台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加速错误资讯的传播并放大激进行动者的声音，尤其是在仇恨言论不再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这进而促成具体政策，例如限制庇护法规、强制边境管控，或影响性别自我认定的相关法令。

> 人类不平等价值的意识形态为 基于歧视的阶层体系提供正当性

正常化因此超越了对极右的传统研究，而强调民主主流内部行动者的角色。「激进化主流」的概念基于并整合了这些洞见。但我们并非聚焦于从极端边缘至主流的「单向路径」，而是揭露主流的所有矛盾与复杂性，在此，既有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与实践，与极右行动者及其意识形态相互交织融合。民主的理念、价值与实践不仅被解构，更被推向边缘。

总体而言，我们将激进化主流定义为一个日益密集的行动者、机构与媒体网路，尽管未必正式隶属于极右政党，却采用或倾向于使用曾属于激进政治团体的话语与立场。

我们将主流视为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现象：涵盖来自不同领域、拥有各种立场与背景的多元社会行动者，他们在各种情境与多种原因下，容纳、认同、辩护并正常化极右意识形态、行动与态度。相对地，激进化指的是一系列从言论到行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透过宣扬人类价值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来正当化并加剧基于种族、性别、极端民族主义及歧视的阶层体系；排斥模式煽动仇恨与暴力，甚至可能导致个人或群体的谋杀行为。

> 复杂的地方、国家与国际层面后果

这影响到所有社会领域：政治、文化、商业、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涵盖个人、组织与制度层面。在此背景下，极右势力的正常化既可视作为一种社会接受的过程，也是一种制度化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若仅专注于激进化的选举面向、极右动员或主流话语转变，将有可能对现象产生扭曲的解读。相反地，我们需要探究复杂的相互作用、矛盾、模糊的界线与意识形态的拼凑，这些因素将原本和善的邻居、朋友或家人变成无知、仇恨或暴力的执行者。如此一来，也让我们得以更深入了解民主与进步行动者、理念与实践被去正常化与边缘化的机制。对自由民主的根本影响变得显而易见：民主理念从社会生活的地方性、国家性及全球性组织原则，缩减成为越来越零散的、由集体组织的平等、团结与希望所组成的孤岛。

我们仅举出少数激进化主流在地方、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影响例子。在许多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社会运动与进步公民社会组织，包括劳工运动、妇女运动、LGBTQI+运动、气候与和平运动以及巴勒斯坦声援运动，甚至亲民主运动，日益遭受刑事化、噤声与打压。封闭边境及对难民的严格入境限制，恶化了流离失所者的保护与安全状况——无论是在他们的逃亡路径上，还是在行使庇护权利方面。强大产业对气候目标的漠视影响全球气候，因为气候无国界也不受国家利益限制。

国际体系同样面临严重威胁。曾经是和平与反法西斯堡垒的欧洲联盟，是否能抵抗来自内外激进化主流的压力，尚未明朗。联合国所维护的人道主义理念遭到质疑，资金被撤回，威胁到全球依赖人道援助的数百万生命。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削弱了过去数十年发展出的多边主义，以应对与管理全球性问题。这种情况在贸易、气候、移民及安全联盟等领域的谈判抵制或退出既有协议中表露无遗。在贸易领域，透过提高关税与（威胁）贸易战，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正逐步推行。

> 民主的更新与再造研究议程

这些仅是激进化主流新常态如何已经并预期将继续促成对人权与民主的保护、执行、尊重与能见度侵蚀的少数例子。若我们想阻止并逆转主流的激进化，我们深信需要透过严谨的实证分析与跨国比较，更深入理解主流激进化的机制。理解主流如何被激进化，最终有助于发展去激进化的理念，探寻「希望愿景」，使民主的价值、实践与社群得以恢复、重生与更新。结合极右正常化与民主去正常化的动态，应成为未来研究议程的核心，从而助力民主的更新与再造。■

来信寄至：

Sabrina Zajak <zajak@dezim-institut.de>

[illegible]

>>

右派政党逐渐在政党政治环境中，由边缘转变为主流。考量到上述社会变动，我们必须时刻谨记如今政治环境的脉络。

> 本世纪激进右派支持率渐增

2000年代初以来，几乎在欧洲的每次选举中，激进右派政党在立法选举中的支持率都是增长的，其明显成为主流政治的一员。2022年9月，瑞典民主党以73席成为瑞典国会第二大党。在法国，国民联盟党在2024年的立法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但在左派政党的策略性合作下，他们并未获得预期的议席数。在德国，德国另类选择党更于2025年2月成为第二大党，赢得近21%的选票，比2021年的得票率增加了一倍。

2022年以来，已有数个右派政党，在选举中成为得票率最高的政党，例如新法西斯政客 Giorgia Meloni 的联盟「义大利兄弟会」便赢得了足够票数，带领义大利组成政府，Meloni 则成为总理。在荷兰，Geert Wilders 率领的自由党在2023年11月的选举中赢得最多议席，由于联盟谈判的争议，政府直到2024年7月才成立，由一位独立公务员担任首相。Viktor Orbán 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掌权，他的非自由主义政府，一直是欧盟的眼中钉。

> 民粹主义的吸引力、种族主义及 对少数族群的恐惧，促使劳动阶级 对右派的支持度与日俱增

虽然说，极右派或激进右派政党不被认真看待，也不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从永远的反对派，变成认真竞争政治权力的角色。自我1990年代中开始研究激进右派以来，种族与移民政治议题的相关规范已经有明显的改变。1999年，Joerg Haider 率领的自由党，在奥地利立法选举中名列第二，当时其他十四个欧盟国家，都认为他的移民和欧盟议题立场太过极端。尽管他们无法改变投票结果，但仍采取措施表示自身立场，比如在2000年通过种族平等指令、[表达反对歧视政策的支持](#)。欧洲的激进右派政党，经常利用民粹主义号召，辩称他们是站在「一般人」这边，并且反对菁英阶级。他们普遍倾向于威权主义，呼吁保护国家安全、防止外人入侵，并期望人民盲目地信任政党或政治人物的领导。另一个因素，是种族主义以及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恐惧，欧洲的政治人物利用这点，来动员那些害怕失去特权，并最终失去政治支配地位的选民。

21世纪初以来，研究者发现，极右候选人在劳动阶级选民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中间偏左派政治人物的成功，如美国总统 Bill Clinton、英国首相 Tony Blair 和德国总理 Gerhard Schröder。这些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支持更为个人化的治理方式。这些政策整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对改善劳动阶层的薪资或福利，却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扩大了财富不平等。如果中间偏左派的经济政策能够改善劳动阶级选民的生活水准，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对激进右派抱持这么开放的态度。可惜的是，当时薪资水准停滞不前，工会会员人数更随着制造业职位的减少而下降。

> 未来何去何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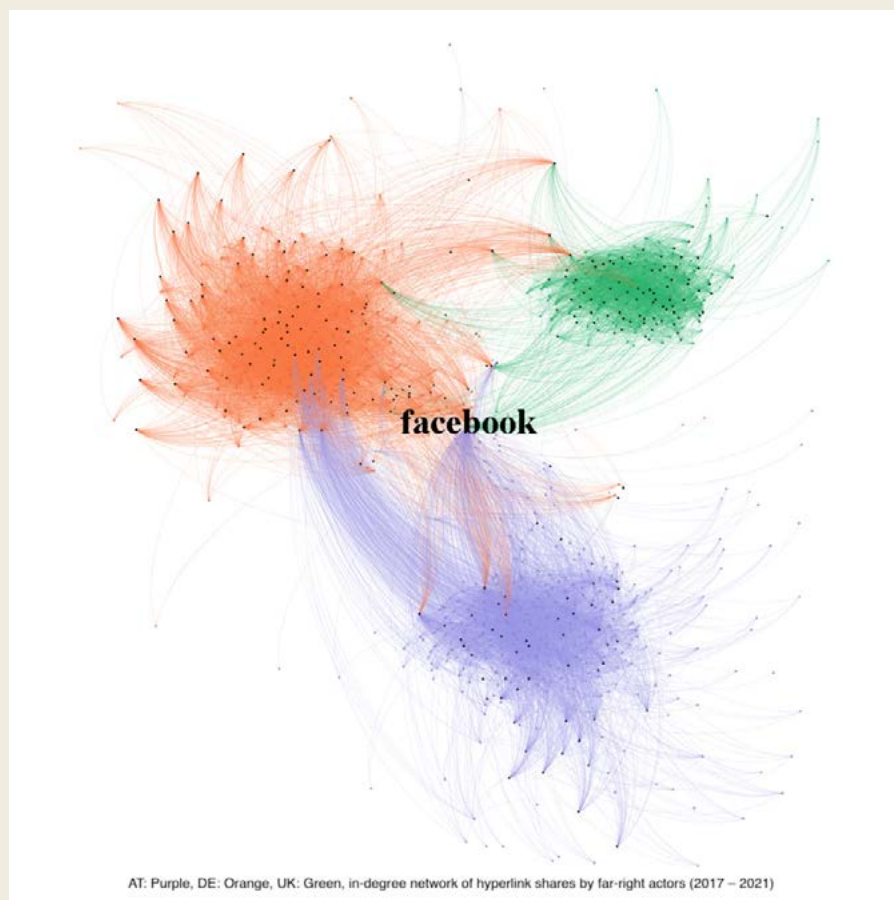
政治局势不断变动，在欧美国家，非自由的政治势力持续得势，这确实很容易让人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悲观。我们仍然期望右派的政府能够维持民主的存续，也希望选民能够支持那些更明确体现民主精神的政党。民主论述是否能够回归主流，并重新成为选民的支持对象？只有时间能回答这个问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需要进行量化与质性分析，试图理解并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如何促成选民与政党之间的互动关系。■

来信寄至：
Terri Givens <terri.givens@ubc.ca>

> 从边缘到核心：

在社群媒体上成为主流的极右派

Damla Keşkekci,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义大利



奥地利：紫色；德国：橙色；英国：绿色。
极右翼行为者 Facebook 页面上共享的超连结
程度网路（2017-2021 年）。
图片由作者生成。

度处于政治场域边缘的极右派行动者，如今正一步步地试图重返政治主流，并将自身定位为正常的、具正当性的政治势力。我们与 Liriam Sponholz 一起在「[激进化西欧主流](#)」的研究中，探讨德国极右势力（由政党、另类媒体与社会运动等各种行为者组成）如何在 Facebook 上策略性地使用超连结。我们分析了 100 个 Facebook 公开粉丝专页上共计超过十二万篇的文章（2017-2020 年），呈现出社群平台的运作如何形塑政治沟通，并促成「平台主流化」（platformed mainstreaming）。

我们归纳出三个极右派势力的推动前述目标的关键机制：（1）建立并维持网路，借此将自己塑造成「正常」的人；（2）透过分享主流媒体的资讯，来「借用」其正当性；（3）适应平台限制，以继续传播他们

的讯息。借此，极右派促成了某种双向的变动——极右派正常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主流激进化。这样的现象，反映着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趋势：边缘与中心、线上与线下、极端与温和之间的界线，正逐渐模糊。

> 社群平台的逻辑与超连结的策略性使用

极右派行动者不只会透过社群媒体进行日常消遣。他们在摸索、逐渐适应社群平台运作逻辑的同时，也尝试克服平台的限制。举例来说，Facebook 的运作逻辑，是透过参与度来奖励能见度。越能让使用者按表情、留言或分享的内容，越会被推广至其他使用者的动态消息中。于是，超连结便成为了强大的工具，其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一致的论述，并连结更多极右派行动者。

超连结的策略性使用，是极右势力于平台上主流化的重要元素。极右行动者主要使用超连结来维系网路、自我宣传和扩大声量。值得注意的是，极右派的另类媒体，如部落格 Tichys Einblick 和俄罗斯赞助的网站 Russia Today DE (RTDE)，皆是以「超级分享者」(super-sharers)——以少量的网域来源，转贴并分享成千上万的连结——的形式运作。其他极右行动者，例如政党（如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和社会运动（如 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 PEGIDA），则作为「超级传播者」(super-spreaders)，以更广泛的来源散播这些连结。分享连结的行为，不仅强化了 Facebook 上极右生态系统的内部连贯性，也有助于重塑其公共形象。

> 策略的转变：

以能见度而非病毒式传播为主要考量

极右行动者的社群媒体策略，并不只是追求透过资讯的转贴与分享达成一夕爆红式的病毒性传播 (go viral)。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持续地让这些资讯在社群平台上保持能见度。这正是平台主流化的关键，其驱动力不仅来自极右势力的意图，也来自社群媒体的规范。Facebook 等主流平台在此过程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它们既是把关者，也是协力者。讽刺的是，即便他们的平台规范以限制和防止极端主义内容为宗旨，最终却可能促成极右主义的正常化。

在 Facebook 的剑桥研究院丑闻后，2018 年发生的去平台化风潮，使得许多极右行动者离开了 Facebook。不过，它仍是使用量最大的社群媒体，且仍然有大量的极右派使用者。在研究中，我们观察到 Facebook 上极右行动者的数量，在调查期间没有什么变动。换言之，Facebook 对德国极右派来说，仍然是极为重要的。

> 隐微的框架与自我连结，

维系了极右派行动者的能见度

虽然超连结的使用率在 2018 年之后略有下降，但 Facebook 上剩馀的极右行动者，依然持续以超连结为主要策略。在我们的资料中，有 69% 的超连结分享，是来自极右媒体与商业行动者的。极右行动者在平台上的存续并非巧合，而是为了维系自身的能见度与影响力，刻意地遵守平台规范的策略性成果。

为了符合 Facebook 的逻辑与准则，极右行动者通常避免公开发表仇恨言论，或分享具有极端主义背景的连结。在此过程中，他们会采取某种表演式的节制 (performative moderation)。他们在社群媒体上淡化自身的言词，专注于隐微的框架、而非明确的行动号召，并在发布的内容中，附上较难监控的外部网站连结。

前述提及的极右另类媒体 RT DE 和 Tichys Einblick 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它们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内容，几乎都会提供能直接连结到自身的网址。这种策略可以让他们绕过内容审查、维持能见度，并有可能向更广泛的受众展现较温和的形象，同时持续地推广排他/非自由议程。

> 「借用的」正当性与主流媒体的角色

平台主流化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借用」主流媒体的正当性。在我们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极右行动者经常在他们的 Facebook 页面上提供来自主流媒体，而非另类媒体的连结。此外，行动者分享的连结种类也各自有异。AfD 便主要分享来自国家级优质报纸的文章，例如 Die Welt，而 PEGIDA 则偏好小报和地区性媒体，例如 Bild 和 Nordbayern。

这种从传统媒体借用正当性的做法，让极右性动者得以将他们的讯息，包装成有着具有信誉的来源。这进一步显示，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界线，可能比许多人所意识到的更加松散。极右派势力不再需要自己制作所有内容，他们选择性地从主流媒体中蒐集素材，来支持其反移民、反菁英或仇视伊斯兰教的立场。

> 对民主的影响

正如德国极右派在 Facebook 上的案例所示，平台主流化的概念，很好地呈现出全球极右派如何在网路上活跃并持续演变。我们今天所见的，不只是「主流的激进化」或「激进的主流化」。相反地，这是一个互相强化的过程：为了在主流社群平台上保持活跃，极右行动者调整策略以符合平台规范，而社群平台的运作逻辑则促使极端的内容，被重新包装成看似温和的形式。

这样的现象影响深远。它挑战了反策略——例如事实检查、内容限制和去平台化的有效性。极右派利用了平台主流化，继续在社群媒体平台所设置的规范内运作——比如借用主流媒体内容、以「更安全」的形式传播，或将受众引导至第三方网站。归根结底，问题不再是极右派是否应该被允许在主流社群媒体上活动：这些平台已经顺利地成为了极右派于线上活动的要素之一。

更迫切的问题是，如果社群平台的规则改变，会怎么样呢？事实上，在 2025 年 1 月，Meta 取消了 Facebook 的第三方事实检查，取而代之的是由使用者生产的「社群笔记」。关于什么内容——尤其是围绕移民与性别认同等议题的内容——可以在平台上发布的规范也已经更新，审核系统的任务缩减，变成只聚焦在较为严重或违法的情况。这些改变对平台主流化有何意涵？

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些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极右势力在网路上的活动量，加速主流势力的激进化，并为自由民主国家带来更广泛的挑战。即便试图以更严格的内容管制来限制极右派行动者，Facebook 仍然促成了极右势力的平台主流化。这种新的平台运作逻辑，似乎对于极右阵营更为友善，让极右派行动者更自由地传播他们的叙事，并进一步使他们在主流政治论述中的存在正常化。

因此，要对付社群媒体上的极右势力，不能仅仅依赖于事实查核与内容限制制度、国家监控或学术研究。由于极右派行动者将会适应社群媒体运作规范的改变，并继续推广论述，这些可能提供能见度的渠道，最终仍可能成为极端主义内容主流化的手段。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采取系统性的方法，将社群媒体平台本身视为行动者，他们是有自身政治议程、以获利为导向的私人公司，并不是一个中立的环境。■

来信寄至：

Damla Keşkekci <damla.keskekci@sns.it>

> 优化阳刚气质：

男性自我提升的网路与意识形态战场

Pasha Dashtgard，美国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极化和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



男孩和男人对自己是谁和他们被期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之间的差距感到痛苦。图片来源：Elias Schäferle，Pixabay。

> 导言

XX 路上专为男孩和男人所设且未受男性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所影响的空间越来越少了。许多以男性为中心的空间，最初是作为寻求建议、支援和友情（camaraderie）的空间而出现的，却已然成为了激进化的温床。无论是在约会和两性关系论坛、健身和时尚社群，还是游戏与运动的讨论板上，恶毒的性别歧视言论正变得越来越寻常。将反动信念巧妙地嵌入那些表面上无涉政治或聚焦于自我提升的内容中，使人难以察觉极端主义观点的存在，从而进一步促进其扩散。

在这些以男性为中心的网路空间中，一条清晰可见的主轴即是对自我优化（self-optimization）的高度关注。在这语境下，自我优化被理解为一种持续进行并专注于持续的自我提升——这通常受到社会期待与个人抱负所驱动——的个体主义策略。虽说自我提升就其本身而言完全是

健康的，然而对自我优化的执着（fixating）却可能导致对最大化身体与生活方式的迷恋，比如透过自我追踪、自律训练、健身、整形手术、神经强化、营养补充品的使用、甚至是在恋爱与人际关系中奉行僵硬、制式化的策略与方法等。自我优化的叙事支撑了许多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依赖于内化的羞耻，自我厌弃以及一种「意志征服物质」（mind-over-matter）的强迫性思维，来推动人们追求一种理想化的阳刚气质。对这些观念的内化将导致一种看法，即把未能进行自我优化或自我优化未果者视为次等的，尤其是在当事人眼中更是如此。这种看法对男孩与男人造成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追求一种由完美的体能、卓越的性能以及出众的财富成就所构成的不可能的组合，其中任何一项的缺失似乎都证明了未能正确体现男性气概之无能。

在生活各个层面都要进行自我优化的这种关切，会加深个体对意识形态灌输的脆弱性。Haenfler（2004）特别指出，个体对自我控制与道德纯洁的关

注如何可能被利用 (weaponized) 于导致次文化的反抗与群体认同的行程。虽然自我提升是一个有价值且值得讚赏的目标, 对自我和群体纯洁性的强调——以及透过痛苦和否定愉悦感来进行规训——会使不怀好意的能动者与有毒的意识形态得以将偏离传统男性理想的行为描绘为一种道德上的失败, 并将其视为女性主义与进步主义颓废腐化现代男性的例证。

> 约会与两性关系：红药丸与「男人圈」的崛起

极右意识形态紮根最明显的领域之一, 即是网路上关于约会与两性关系的讨论。在所谓的「男人圈」(manosphere)——一个充斥男性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线上空间网路——中遍布的「红药丸」(Red Pill) 社群, 是男孩与男人最容易接触到的空间之一, 其中提供了关于如何操控女性、如何与尽可能多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以及如何扮演女性们无法抗拒的「强大、性感的 alpha 男」等等的建议。这些论坛、网站、应用程序与平台将女性主义与女性赋权视作对男性的直接威胁。在这些社群中, 传统的性别角色被强化, 女性被描绘成善于操弄、追求高嫁 (hypergamous) 且不可信赖的存在。信奉这些观念的男性被鼓励去支配两性关系并拒绝任何形式进步的性别平权。尽管这些观念起初只是约会建议, 它们却往往成为通往更广泛反动政治的入口。

「男人圈」中另一个有毒的子群体是「厌女的非自愿单身者」(misogynistic incel)——「incel」意即非自愿单身者 (involuntary celibate)——社群。厌女的非自愿单身者们相信, 一种压迫性的女性主义社会秩序——即女性只会选择有魅力且具支配力的男性——使他们在恋爱与性方面陷入绝望。许多非自愿单身者将个人困境归咎于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它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变迁, 这种怨恨情绪可能进一步滋生暴力行为。非自愿单身者们采取一种宿命论的、生物决定论的社会观, 这种观念认为一个人的基因与外貌要么保证其在性、财富与社交上获得成功, 要么注定陷入悲惨与失败的人生。与非自愿单身者相关的暴力事件日益增加, 包括多起大规模枪击, 显示了这些有毒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 时尚与健身：从「拼命变好看」到极端主义

表面上为男孩及男人们在如何更好地穿搭、练就六块腹肌、改善仪容等技巧上提供建议的网路空间, 正日益被那种利用男性的不安与他们想要在所谓男性阶序中向上攀升的渴望的叙事所佔据。

「拼命变好看」(looksmaxxing) 是在一些专注于时尚、外貌及健身的线上自我提升社群中所流通的网路用语, 指涉的是如下过程: 个体透过伪科学、「另类」疗法, 以及各种当代男性至上主义的庸俗骗话 (quackery), 来分析并进行最大化自身外貌吸引力。虽然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种无害的自我完善形式, 但许多「拼命变好看」社群增强了许多有关阳刚气质、遗传学与社会阶层的有害观念。这些讨论往往与优生主义信念交织在一起, 鼓吹只有特定身体特征 (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 是值得向往的, 并将基因决定论描绘为无法超克的现实。

健身文化也成为了极右派激进化的入口。许多男性至上主义网红 (influencer) 利用健身及男人想要增强身体的慾望来倡导主流阳刚理想的观念。对力量、纪律和支配力的讨论, 有时被构造成对抗个体道德堕落并进一步扩展成对抗整体社会衰败的方式, 这些叙事加深了意识形态的分裂。在某些线上健身社群中, 无法维持精练、强壮的体态, 会被视为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 即无法控制自身慾望进而沈溺于自我失控之中。

极右派对健身日益浓厚的兴趣已促成所谓的「积极俱乐部」(Active Clubs), 将武术训练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结合。这类俱乐部通常以自我防卫、自我提升与赋权之名吸引男性加入, 实际上往往成为政治暴力的训练基地。健身与极右派极端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 凸显了看似无害的网路社群如何可能最终导向在现实世界中的激进化。

> 运动与电子游戏：男性至上主义常态化的新战场

除了传统的自我提升空间, 男性至上主义意识形态也渗入了电玩和运动相关的论坛, 这些论坛可是男人与男孩们在网路上的主要文化据点, 结果是, 自我优化叙事也同样植入到关于运动和电子游戏的各种论述当中。

电子游戏天然地促成了一些小众网路社群的形成, 基本围绕着特定游戏或开发公司而建立。「玩家门」(#GamerGate) 是一场发生于 2014 年的争议事件与线上骚扰行动, 表面上以探讨电玩新闻伦理为核心, 实则由游戏社群内部的厌女情绪和反进步倾向所驱动。这场事件牵涉了对游戏产业中的女性的有组织的骚扰、肉搜 (doxxing) 以及威胁, 特别针对那些倡导多元与包容的开发者、评论者与记者。「玩家门」事件展现了电玩如何塑造强烈的社群认同感, 以及游戏社群在特定条件下容易受到激进化影响的潜在风险。许多游戏论坛培养出一种「政治不正确」文化, 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与恐同的笑话屡见不鲜, 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强化排他性的世界观。虽然「玩家门」已不再是当今网路上的动员主力, 其遗绪仍可见于部分玩家群体对具有多元选角、或聚焦于被视为「觉醒」或进步主义的角色故事的游戏、电影和电视剧所做出的反应。

此外, 运动类网红透过 Youtube 和播客等平台推动反动叙事, 针对从事社会运动的运动员进行批评, 并将保守派政治评论与媒体报导混合在一起, 时常抨击体坛中的进步运动 (progressive movements), 比如争取种族正义的抗议行动或促进性别包容的倡议。其中一个例子是知名体育媒体品牌 Barstool Sports, 在将男性至上主义观念主流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尽管它将自身表现为轻松搞笑、充满兄弟文化 (bro-culture) 的媒体平台, 其内容却经常宣传厌女情绪、贬低进步运动, 并助长一种超阳刚 (hyper-masculinity) 的文化氛围。Barstool Sports 长期经营的专栏有「猜猜那屁股」(Guess that Ass)、「猜猜那对胸」(Guess that Rack) 以及「扭扭星期三」(Twerk Wednesday)。Barstool Sports 创办人 Dave Portnoy 在 2010 年写过这些话:「我从不赞成强奸, 但如果妳是六号身材又身穿紧身牛仔裤, 那妳有点像是活该被强奸, 不是吗?

」透过将这类言论包装为幽默、前卫或反叛，将使这些观念更容易吸引那些只是想关注体育新闻的年轻男性，使他们在不自觉中也接触并吸纳了男性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

> 结论

男人与男孩们的数位空间日益受到男性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塑，将原本是支持性的社群转化成激进主义的温床。在自我提升的乔装中——无论是透过约会建议、健身、时尚、运动还是电子游戏——这些空间使反动信念常态化，增强了传统性别阶层以及排他性的理念。极右意识形态对这些空间的渗透，凸显出建立更健康、更具包容性的男人与男孩社群的迫切需求。

要对抗这一趋势，我们必须问：男孩们和男人们如何建立社群，而不必被迫接触以男性至上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内容？答案是去开创新的、积极的空间来推广健康的男性气质、情绪智力与真诚的相互支持。鼓励针对认同、脆弱与尊重开放对话，有助于导引年轻男性远离有害的影响。最终，社会必须投入资源来培养具包容性的环境，使男人和男孩能在其中相互联络、共同成长，而不至于被有害的意识形态所吸纳。男孩与男人渴望寻找提供建议、指引与归属感的社群与网路空间；但这些以男性为主的空间完全没有理由必然沦为厌女与极端主义的温床。

来信寄至：
Pasha Dashtgard <dashtgard@american.edu>

*译注：「Alpha male」原指动物群体中具支配地位的雄性，后来被用来形容在人际关系中展现自信、领导力与性吸引力的男性理想形象。与之相对的「Beta male」则指较内向、顺从、缺乏主导地位的男性，常被某些网路社群贬为不成功或不具魅力的失败者。这个概念在当代常被用来推崇男性优越，也受到批评强化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

> 极右派对时尚的武器化

Andrea Grippo，维也纳美术学院，奥地利



从统一到碎片化：极右翼的审美漂移。
图像由作者使用 ChatGPT 建立。

极右派的集体行动经历了深远的转型。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抗之外，着重于象征性、美学性与表演性的文化策略已大幅扩展。极右派的行动者如今试图透过生活风格的实践来重塑集体想像、重新界定文化归属并影响日常生活。

> 极右派时尚的角色变化

时尚已然成为极右派在争夺文化霸权的战斗中最有效的工具，提供了一个能以宣传并常态化排他叙事、民族主义神话以及威权主义理念的媒介。在极右派文化转向的核心处，时尚已然被有策略地武器化 (weaponized)。

在纳粹光头党 (Nazi skin) 次文化中，时尚作为进入该群体的门径以及建构认同的关键工具而发挥着功能。透过「拼装」(bricolage) 的过程，纳粹光头党结合了英国工人阶级风格、牙买加与摩德风格的影响，塑造出一种独特的光头美学：剃光的头、皮革外套与军靴。尽管在历史上曾具有强大影响力，这种光头美学在今日也仅是极右派更为广泛而分散的视觉文化中的一个支流。

自1990年代末以来，极右派时尚趋于多样化，从过往的明显 (overt) 的符码转而倾向于伪装 (camouflage) 与暧昧 (ambiguity)。美学上的一致性不再是进入此运动的必要条件；相反地，时尚成为展现差异性和适应力的空间。正如 [Miller-Idriss 所观察到的](#)，「今日的极右派青年可以表达自身的个性同时仍然是一个右翼分子。」

极右派拥抱「时尚的语言」(language of fashion) ——这不仅是一种表达身分与归属的方式，还是借由符号、风格与日常消费品来获取能见度、吸引新追随者并将其世界观予以正常化的手段。美学策略穿越各个极右派世代而演变着，在视觉语言 (visual language)、风格及象征的运用上展现出显着的创新，用以传达其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这些美学转变促使一种进入主流空间的柔性入口，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可接受范围的边界。

> X 世代 (1965-1980)：美学反叛与混合风格

1990年代末，极右派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美学转变，脱离纳粹光头党次文化那种僵化的一致性，转而拥抱更为多样、混合且带有叛逆性质的美学风格。这个时期出现的关键视觉原型是维京战士：符文、英灵殿 (Valhalla) 意象以及诸如索尔 (Thor) 之类的神话人物成为服饰上反复出现的主题，既作为力量的标志，也作为族裔传承的象征。这些神话意象开始与极右派传统符号交融，结合了诸如重机骑士、摇滚族与小流氓 (hooligans) 等来自反文化领域的元素。街头服饰 (streetwear) 开始成为一个关键的参照，形塑出一种平衡了阳刚叛逆与意识形态暗示的视觉认同。符号变得更加隐晦和含糊，容许穿戴者表达其归属感的同时避免立刻受到公众的审视。

转泪点出现在德 Thor Steinar 的兴起，该品牌的风格结合了北欧-日耳曼神话与户外机能性，其标志、数字（比如「44」）与符文符号构成了一个符号学上的灰色地带——可于极右派圈内加以解读（decipherable），并在公共领域加以否认（deniable）。甚至品牌名称本身也结合了北欧雷神「索尔」（Thor）与「斯泰纳」（Steinar），暗示武装亲卫队（Waffen-SS）将军 Felix Stainer。其策略是显而易见的：将激进的符号嵌入迎合主流（mainstream-friendly）的设计之中。

这一策略成了典范。像 Erik & Sons 和 Ansgar Aryan 等品牌随之而起，强化了一种强调传承、力量与反抗的「战士」精神——这些实则是白人至上主义的符码，却包裹在看似中性的美学风格之下。

> 千禧年代（1981-1996）：古典时代与文化伪装

数位文化的兴起促使极右派时尚的又一次转化。侵略与军事风格的打扮让位给更洗练也更具市场吸引力的美学——休閒运动风、日常风（normcore）以及文青风（hipster）。极简的 Polo 衫与柔和色调取代了战斗靴和飞行夹克。

就象征层面而言，维京主题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对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拥抱：斯巴达、罗马、方阵（phalanxes）、军团。极右派重新想像自身为一个受到多元文化主义围攻的希罗文明继承者。在这样的视觉文化中，欧洲被塑造成一个独立且文化上纯粹的文明整体。这一转变与「族裔多元主义」（ethnopluralism）一致——强调文化分离而非种族层级。诸如 Phalanx Europa、Pivert 以及 Peripetie 等品牌，将希腊与拉丁标语以及英雄式的意象融入到日常风的服饰之中。

坚韧（resilience）与文化起源等主题，透过一种干净、亲和的美学风格被传达出来。这一策略使这些品牌能够同时在激进圈子和主流空间中流通。服装成了特洛伊木马：外表显得中性平和，却充满意识形态张力（ideologically charged）。

> Z 世代（1997-2012）：美学过度常态化与视觉操演性

而就 Z 世代方面来看，极右派时尚吸收了反讽、柔和与暧昧的风格。这一代人成长于网路时代，将迷因文化、大众审美与反叛性（subversion）融为一体。意识形态讯息被嵌入轻盈的或幽默的设计之中——经常引用如 LGBTQ+ 意象或左派口号等对立象征，只为了随后再挪用于嘲讽或意识形态倒装（inversion）。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极右派 YouTuber Tim Kellner，其商品设计以彩虹色、独角兽与反讽性的标语来嘲弄包容性与性别多样性。这些商品将明亮、包容性的视觉风格与仇恨内容融合在一起。这种精心设计的视觉错位（dissonance）——以流行包装包裹激进内容——已成为 Z 世代极右派的标志性特征。

> 结论

从一致性到混合，从神话到古典文明，最终又从符码暗示到过度常态化的反讽，极右派时尚已演变成一套高度精致化的文化传播系统。一开始作为次文化认同的表达，如今已然发展成一个完整运作的生活风格市场，能够透过日常服饰将极端主义叙事加以常态化。

将极右派美学与主流时尚进行整合不仅是一种品牌操作，而是一项为了达到常态化（normalization）的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透过将其意识形态嵌入日常消费文化中，极右派行动者正在移动可接受之言论的边界。他们对日常风格与极简风格的运用，使自身看起来显得无害，从而将自身的观点塑造成更广泛并且常态化的政治景观的一部分。结果是一种微妙而阴险的美学战争——极端主义被包装在柔和、反讽与主流爱好之下，使得抵抗变得更加困难以及渗透变得更加有效。最终，美学是被武器化了，而极端主义则被常态化。■

来信寄至：
Andrea Grippo <a.grippo@akbild.ac.at>

*译注：Waffen-SS 是纳粹德国时期隶属于党卫队的军事组织，以高度忠诚与意识形态著称。该部队在二战中参与多场战役，也因涉及大规模战争罪行而臭名昭著。

> 极右翼如何 侵蚀了公民社会

Sumrin Kalia，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德国



2022年3月30日，人们聚集在卡拉奇举行的TLP集会上。
图片由作者拍摄。

>>

在整个欧洲及其他地区，极右势力不再是处于边缘的势力。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选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运用国家机器在法律面上起诉少数民族、镇压人权组织，并鼓励私刑暴力对付边缘社群。

那么，究竟极右翼政党为何以及如何获得大众青睐？这些问题成为当今许多学术研究的焦点。[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快速转变，造成了大众对经济和文化上的不满，因此，这个条件也为极右政党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他学者则认为，主流政党反应冷淡；此外，以阶级为基础的投票衰退，以及政治媒体化的日增，都促进了极右排外主义思想容易取得与大众的共鸣。

> 以巴基斯坦为案例

其实，上述条件在某些国家一直存在，例如巴基斯坦。然而，军方的监护控制和选举竞争的制度化薄弱，限制了极右政党在巴基斯坦的崛起。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仍是相当受大众欢迎，并导致民众对巴基斯坦少数民族、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团体的敌意大增。

在此篇文章中，我认为要理解极右思想如何取得大众的共鸣和它的被正常化，我们需要将焦点转移到公民社会，将其理解为社会和政治参与的领域。极右翼政党[运用运动策略](#)来利用现有的不满，扩大其思想的影响力，并[改变政治行为、态度和文化](#)。

为了叙述我的论点，我研究了巴基斯坦极右政党的案例。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来研究极右思想在公民社会中的正常化，因为政治体制在执行民主规范方面很薄弱，军方透过选择性的赞助和镇压政治行动者来控制政治竞争。因此，政治竞争蔓延至民间社会，极右翼政党不只参与传统的政治偏好形成，也参与具争议性的政治动员。

接下来的内容，我会说明极右翼政党如何使用类似社会运动的策略来增加其排他主义与社会大众的共鸣。特别是，我说明了政党领袖、成员和社会运动参与者使用的三种技巧，以扩大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标准。

> Tehreek-e-Labbaik Pakistan (TLP)

Tehreek-e-Labbaik Pakistan (TLP) 自称是一个宗教政党，主张捍卫巴基斯坦的反亵渎法律，这些法律特别针对冒犯伊斯兰教、其神圣人物与《古兰经》的行为。TLP于2018年首次在全国选举中崭露头角，推出262位候选人，成为全国第五大政党。到了2024年选举时，他们的得票数已升至全国第四，超越了所有传统的老牌伊斯兰政党。除了参与选举，TLP也强烈反对任何针对亵渎法进行改革的讨论，并为针对阿赫迈底亚教派信徒、女性主义者与社会运动者的暴力攻击与法外杀害行为辩护。

巴基斯坦是一个能够说明极右思潮如何在公民社会中被「正常化」的有力案例。这是因为当地的政治竞

争并不完全透过选举制度进行，而是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角力。由于军方长期掌握实权，对司法、立法与行政体系形成强大制约，也大幅限制了公民自由，使得民主制度的运作始终薄弱。此外，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菁英阶层的垄断，进一步压缩了社会的流动空间。左派、世俗团体与女权运动的发展也受到打压，难以茁壮。[在历史上，军方为了维持自身控制地位](#)，经常对各种政治势力采取选择性的保护政策，包括伊斯兰主义者。过去的军事政权偏向支持迪奥班德学派（Deobandi）与萨拉菲运动（Salafi）之团体，而现今的政权则助长了TLP的崛起，不仅提供其更多政治空间，也提升了其政治正当性。

> 侵蚀公民社会的技巧

与欧洲大多数极右政党一样，TLP结合了选举与社运策略，使其能同时参与公民社会与正式的政治竞争。极右翼政党在转型为正式的政治实体之前，通常会先在公民社会中发起社会运动，再将自己组织为运动或公众政党。[作为混合体](#)，他们结合了选举和社运策略，政治企业家和社运份子也同时投入具争议性的政治动员和传统政治偏好的形成。

作为一个运动型政党，TLP运用了我在下文中详细介绍的三种技巧来扩大其影响力，并在公民社会中获得合法性。我将这三种手法合称为「侵蚀公民社会之手法」，以扩大其政党理念与行为准则的影响力。我所说的侵蚀，是指一个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与非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被突破，以致于非公民社会侵蚀了公民社会。

> 叙事的重构

TLP重塑其宗教叙述以实现其政治目标。例如，先知造访塔伊夫（Taif）的故事——这段历史过去常被视为展现忍耐与宽恕的典范——然而，却被 TLP 魅力十足的领袖 Khadim Hussain Rizvi 改写为一则鼓动仇恨与复仇的叙事。同样地，Ilam Din 的故事——一位年轻穆斯林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刺杀一名印度教出版商——也被 TLP 的行动者重新诠释为讚颂法外暴力的象征。这些重新演绎透过富有煽动力的演说、经过剪辑的社群媒体影片，以及将宗教虔诚与政治行动混为一谈的修辞手法进行强化。

> 运用掇客游走于不同网路

TLP透过吸收草根社运者来扩大其影响力，这些行动者在不同网路之间扮演掇客角色，使 TLP 得以渗透既有的宗教组织与网路。例如，在 2018 年选举期间，TLP 的行动者与 Dawat-e-Islami (DI) 及 Sunni Tehreek 等组织建立联系，并利用 WhatsApp 群组传播 TLP 的宣传讯息。同样地，他们也在 Anjuman-e-Tulba-e-Islam (ATI) 等学生组织中散布政治言论，为TLP的Faizabad静坐行动争取支持。这些掇客促进了该党影响力向其核心教派基础之外扩展，进一步延伸至不同的宗教、教育与政治领域。

> 符号表演

TLP将其排外思想嵌入既有的宗教符号与实践之中，以增强情感共鸣。清真寺——尤其是位于卡拉奇的Bahar-e-Shariat 清真寺——成为将例行宗教集会转化为政治动员场域的重要空间。原本用以颂讚先知的仪式，也被重新利用来传播TLP的政治叙事。在选举活动中，具象征意义的先知履屐（Nalaa'in）被当作竞选标志，而原本表示虔敬的亲吻拇指行为，则被重新诠释为支持TLP、投票给TLP的象征行动。

TLP的扩张并非凭空发生。在巴基斯坦，早已存在的社会文化分化、军方支持、以及反对社会运动等弱势的条件，皆助长了该党的渗透与崛起。TLP善用历史上的伊斯兰运动，特别是1950与1970年代的反阿赫迈底亚（Ahmadi）运动，重新叙述并以「维护先知的神圣性」为核心诉求，塑造自身为宗教正统的代表，借此取得政治与宗教上的合法性。它也受益于巴基斯坦的混合政体结构——军方对宗教政党采取选择性的容忍与支持，却同时压制其他政党。这样的局势，使得TLP的影响力得以突破其传统的巴雷尔维（Barelvi）教派支持者，进一步扩张。与此同时，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例如宗教少数群体、左派政党与女性主义者，则持续受到打压与政治赞助制度的限制，难以有效回应TLP持续扩大的影响力。

在缺乏健全公民自由、宗教民族主义盛行，以及政治庇护主义深植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提供了极右势力渗透与侵蚀公民社会的肥沃土壤。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在那些政治体制强健、公民权利受到保障、政治竞争制度化的社会中，极右势力是否仍有可能侵蚀公民社会？若是如此，它们又是透过什么方式实现的？最终，唯有健全的政治制度与强大的公民社会，共同构筑防线，才能有效抵抗极右思潮对公民生活的侵蚀，以及其在全球政治体制中正常化之趋势。■

来信寄至：Sumrin Kalia <sumrin.kalia@fu-berlin.de>

> 民粹主义治理

对公民社会倡议的影响

Roberto Scaramuzzino 和 Cecilia Santilli, Lund University, 瑞典



在游说和宣传之间。
图像由作者使用 Microsoft Copilot 建立。

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自由民主国家崛起，引发了关于民主现况与未来的激烈讨论。瑞典是明显的例子：该国拥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以及对公共机构高度的信任，但右翼民粹政党「瑞典民主党」却在一届又一届选举中屡战屡胜。2022年选举后，瑞典民主党透过支持由自由保守党领导的中右翼政府，直接介入国家政策制定。

>>

本研究团队凭借于隆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在公民社会研究领域的丰富经验，并获得瑞典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于2024年启动了一项名为「公民社会与民粹主义：民粹政党崛起如何影响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研究计画。该计画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聚焦于两个国家：瑞典与义大利。后者是个有着悠久右翼民粹政党影响政府政策历史的自由民主典范。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我们介绍该计画的研究议程，并分享近期发表于《政治、文化与社会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的一则案例研究心得。

> 倡议在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地位

公民社会组织（CSOs）在自由民主制度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倡议。对某些组织而言，这意味着为其成员的权利或利益发声，如妇女、身心障碍者或其他少数群体的权益；而另一些组织则追求较为普遍的利益，且不具严格的代表性角色，例如专注于永续发展、和平或人权议题。这种倡议角色是自由民主的重要特征，前提是必须能够参与自由的公共讨论与政策制定过程。因此，公民社会组织可被视为国家机器与公民之间的中介者。

这种倡议角色可能与许多右翼民粹政党对其在社会及政治体系中定位的理解产生紧张甚至冲突。这些政党倾向强调领导者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连结，拒绝像公民社会组织这类中介者，视其为腐败菁英的一部分。此外，过去数十年中，许多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公民社会组织，起源于推动人道主义、团结、少数群体权利及反歧视的社会运动。这些价值观与许多右翼民粹政党所持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及价值保守立场形成冲突。

> 倡议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四种回应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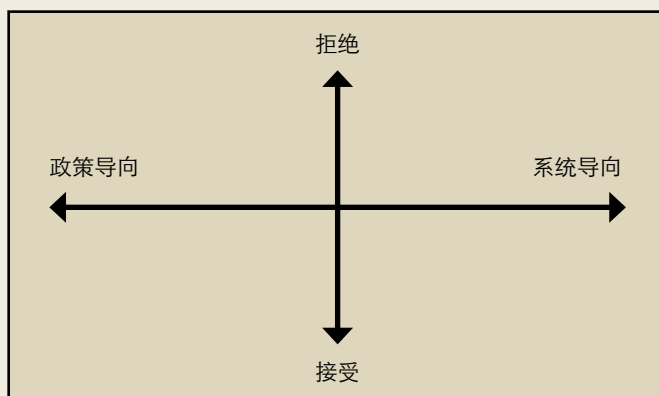
我们的研究探讨义大利与瑞典在2024年中，具有实际运作效能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回应政府的预算立法。预算立法是治理中的关键环节，负责为各项政策分配资源，包括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资助。它也可能成为民粹治理的重要工具，民粹治理即指民粹政党行使权力的方式。我们研究具实际运作效能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因为它们在政策制定中居于核心地位，且拥有相当的资源，故其行动能力若因资金削减而受限，将深受民粹治理措施所带来的变化影响。同时，这些组织也因其运作效能，能够对政府的规定提出批评，尽管这可能冒着失去其特权地位的风险。

为了理解不同的倡议策略，我们建立了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对政策变动回应的模型，基于两个维度：1）批评的程度，从接受到拒绝；2）批评的范围，从针对政策到针对制度。这两个维度相互交叉，形成四种不同的回应选项，如右方的模型所示。

该模型根据这些维度对回应进行分类。政策导向的接受（左下角）适用于大致接受政治现状，但可能批评具体政策细节的公民社会组织；系统导向的接受（右下角）则适用于接受较广泛政治架构，但主张重大体制改革的公民社会组织。

关于较具冲突性的回应，政策导向的拒绝（左上角）适用于反对民粹政府特定政策或倡议，但不挑战整个体制的公民社会组织；最后，体制导向的拒绝（右上角）则适用于根本反对民粹治理并主张全面转型变革的公民社会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对政策变动的回应



资料来源：作者。

> 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会有不同的回应方式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四种回应类型皆有实例，显示公民社会组织对民粹治理所带来的变化反应可能截然不同，这取决于它们在组织领域中的定位。某些政策领域可能较多或较少面临被公民社会组织视为不利的改革，影响成员对该组织影响力或所代表利益的认知。与活跃于特定政策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相比，有些致力于代表整个公民社会部门的组织，可能会采取较具冲突性或较谨慎的态度，这或许取决于其成员之间的共识程度。根据其意识形态与使命，有些组织也可能对其所感知的民族主义一保守议程感到更大的威胁，例如与工人或移民运动相关的组织便是如此。

这些结果显示，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会根据对改革影响的认知、其关注的政策领域、意识形态与价值基础，以及其在公民社会部门阶层中的位置，对民粹治理做出不同的回应。

> 情境因素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回应具有影响

比较研究的一个核心价值，基于情境对我们关注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假设。义大利与瑞典作为欧洲稳定自由民主国家框架下，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境。义大利的公民社会传统上主要以提供服务为导向，而瑞典的公民社会则偏重于表达性功能与倡议。义大利对公民社会的国家资助通常较为间接，透过区域及地方政府，而瑞典则较为直接，由国家机构管理。此外，两国的民粹政党类型、历史发展轨迹及取得权力的途径也存在差异。

尽管我们发现义大利与瑞典公民社会组织对预算立法的回应存在显著差异，但同时也观察到在各自国家内，公民社会组织的回应呈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在两国中，我们都看到与四种回应类型中三种相关的回应实例。然而，当检视并比较两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回应时，

我们发现瑞典的公民社会组织较倾向于拒绝民粹治理，并提出更具体系性的批判。鉴于我们的案例研究基于较少数的公民社会组织（每国各11个），这些结果仍显示国家情境确实对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回应民粹治理有重要影响。

造成这些差异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义大利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组织较早面对这些政策的国家，民粹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已逐渐发酵，而这种常态化尚未对瑞典的公民社会组织产生明显影响。义大利公民社会部门较偏向提供服务的导向，也可能使公民社会组织较不倾向于批评政府，相较于瑞典那种较重视倡议功能的部门。进一步检视公共机构，我们也可考虑在一个国家中，如瑞典，国家直接控制公民社会资金，针对阻挠反对派公民社会组织的民粹治理措施，会对这些组织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合理地引发更强烈的反应。

> 公民社会组织能否成为民粹治理的制衡力量？

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必须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运作良好的自由民主国家，非民粹政党执政的政府也曾对公民社会组织实施限制措施。因此，在不同情境下，许多公民社会组织感受到公民空间缩减，这并不令人意外。这种日益有限的行动空间，伴随着针对许多运作有效的公民社会组织所关注群体与议题的限制政策。公民社会组织能在保持有效运作的同时，对公共政策持批判立场的程度，一直是公民社会研究中的核心议题。这个问题在民粹治理时代尤为重要，因为民粹治理可能导致民主倒退及向更威权统治的转变。此外，由于民粹治理与右翼话语的常态化，公民社会组织可能更不愿意追求批判性的倡议功能。因此，未来仍需进一步研究民粹治理时代下，以及其他国家情境中，公民社会组织活动的结构性与组织性的预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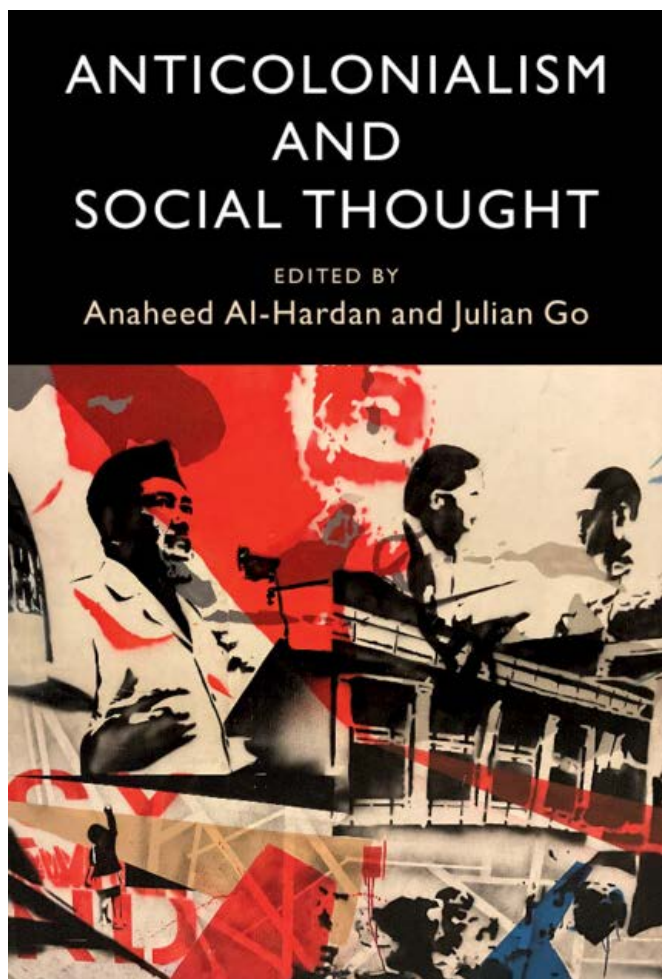
来信寄至：

Roberto Scaramuzzino

<roberto.scaramuzzino@soch.lu.se>

> 历史与社会理论中的反殖民主义

Anaheed Al-Hardan, Howard University, 美国, 以及 Julian 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美国



《反殖民主义与社会思想》。
由 Anaheed Al-Hardan 和 Julian Go 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
预计网路出版日期：2025 年 8 月。

过去数十年，人们花费了许多心力尝试将社会理论「全球化」、推翻主流社会学观点的限制，并重新思考理论经典。我们认为，应该要让反殖民主义重回讨论焦点，并将其视作前述行动的核心。作为反帝国主义的观点，反殖民主义陆续产出了许多创新且重要的社会思想。于二十世纪改变帝国世界的抗争中，反殖民主义者对帝国世界提出了毁灭性的批判——他们挑战了帝国的种族主义、经济剥削、政治排除和社会不平等，并试图更好地理解他们所对抗的世界、发展新的概念与理论方法。在此脉络下，反殖民主义促成了新颖的社会分析、概念，以及理解社会相关的理论：一种真正具批判性与多元观点的社会学想像。因此，借鑑于反殖民运动及其思想家，将是主流社会学观点破除自身局限的关键策略之一。

> 定位反殖民思想

现代欧美帝国主义，是从十五世纪征服美洲时开始，并在二十世纪最为活跃，其以殖民主义作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二十世纪时，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殖民帝国或前殖民地。时至今日，帝国主义仍继续以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形式构建世界。然而，来自农民、抵债劳动者（bonded laborers）、被奴役者，或是反对欧洲、美国统治与其带来的不平等的社运人士、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等等的反抗也持续存在。从 Standing Rock 到 Gaza 的反殖民主义，如今也仍然抵抗着帝国列强的侵扰。从美洲原住民反抗殖民者统治、海地反法革命、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时代反抗欧洲帝国的武装抗争，到最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为巴勒斯坦占领大学校园……等等活动，反殖民主义抗争以极为多样、谱系复杂，且具多元传统的形式，持续形塑并挑战着世界。

历史学家呈现出反殖民运动的几个关键面向，并说明其复杂性、矛盾与困境；我们的目标，则是要重新讨论反殖民主义的理论与知识层面。正如我们共同编辑、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Anticolonialism and Social Thought》所述：反殖民主义在挑战帝国与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将继续生产新颖、创新且关键的社会思想。从过去到现在，反殖民主义领域一直极为活跃，其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流派，许多至今仍然极受人们重视。因此，我们应该将那些由反殖民主义衍生出的思想，作为社会理论的主要来源。我们将反殖民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立场，它承载着某些文化、社会与经济承诺，并且以扭转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为宗旨。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立场皆涵盖了一系列的批判观点与计画。在这份研究中，我们会重新检视这个立场的社会与社会学层面。

> 挑战帝国主义的立场

我们的贡献有两个主要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界广泛流传的社会理论，大多起源于悠久的帝国主义传统，并隐晦或明确地涵括了「帝国主义立场」。现今所谓的社会学，以及其抽象原则的表达方式——「社会理论」，皆是在上述欧美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社会理论在帝国中诞生／源自帝国／为帝国而生，其处理特定种类的问题、制定出独特的概念与理论，并在研究中反映出帝国都会菁英的利益、关注与经验。其中，反帝国主义的声音确实存在，例如 W.E.B. Du Bois，但他们却受到了排挤。

我们可以由分析类别、基本假设与研究问题中发现，今日的社会科学，仍然带有早期帝国主义的印记，它们仍旧反映着帝国都会的利益与关注。由帝国主义立场出发而构成的传统社会理论，受到自身狭隘且华约的观点所限制。正如近年来许多学者指出，许多学科的社会科学，从理论到研究方法，都无法认真看待自身与帝国主义及种族主义的关系、持续的欧洲中心主义及东方主义，也难以承认自身忽视了世界上多数人口的经验、利益与关注。与此同时，社会理论与社会学受限于帝国视角，陷入本质主义、分析的分歧，以及以大都会为中心的预设等困境。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到 Foucault 等被视为「批判」的主流理论家，其理论皆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使在所谓的「后殖民」世界，许多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科学，仍带有欧美帝国主义的遗绪——尤其因为在许多国家，社会科学最初就是在欧洲帝国与后来的美国帝国文化中形成的。

第二个前提是，要克服社会理论与帝国、帝国主义的基础关系所遗留下的恶果，我们必须超越学科内现有的尝试，让社会学及其理论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对世界经验的多样性更加开放。那些以「本土社会学」、「南方理论」或「南方知识」为主轴的计画，对此达成此前提来说便极为重要。此外，许多其他的计画，也同样试图寻求社会科学的「自主传统」，或试图重新强调欧洲以外的独特区域与国家传统。这些认识论的计画都很有价值，并且以重要的方式推进了对话。同时，它们都有各自的焦点与限制。我们认为，透过把反殖民主义视为作为社会思想的来源，将能够克服这些限制。

> 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地理并非反殖民主义理论或政治承诺的必要条件

现有方法的主要限制在于，它们是以一个狭隘的问题——即欧洲中心主义——为对象，并以地理为基础来设计其应对方式。根据现有方法，主流社会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源自欧洲或「西方」，因此，补救之道便是寻找「非西方」或「非欧洲」的思想或思想家。其目标是找到并使用「非西方」、「本土」、「亚洲」、「非洲」或「南方」的思想家，以及寻找「西方」和「全球北方」的「外部」的知识空间。亦即，这些方法挑战的是思想的地理发源，而非其内容，并预设了后者是由前者所决定的。在这样的预设下，只要某位社会思想家居居于「非西方」或「非欧洲」地区，他们的思想就会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而受到重视。

这类根植于地理学的、针对欧洲社会科学的批判，当然有其道理。从历史来看，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大致上确实能够于全球地理上呈现出来，其中，资本主义的核心，即欧洲与后来的美国，经常被理解为「西方」，以及最近我们所说的「全球北方」，其在物质与知识上主宰着「东方」或「全球南方」。然而，这种粗略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地理，并未能完全解释帝国主义中心里面，被殖民与种族化的现实。原住民社区和其他被殖民、奴役者的后代，不只住在全球北方，也住在全球南方。此外，欧洲殖民者及其后裔，也会居住在过去曾被殖民、或正被殖民的地区。

由此延伸出来的另一项限制是，我们很难直接将地理位置，反映到政治承诺或知识形式上。并非所有社会思想家，或是所有源自前殖民世界的理论，就都是反殖民的。前殖民世界的社会论述，仍然可以内化帝国主义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历史散播并制度化了帝国主义的假设，也是因为当代知识生产的地缘政治环境——其服务于当代帝国主义的利益，并复制了新殖民主义的全球知识生产结构。同理，并非所有「欧洲」或「全球北方」的理论家，都必然是霸权帝国主义认识论的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过去不支持，现在也不支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且不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是那些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已经在大城市中扩散。在书中，透过与殖民地夥伴的对话，我们呈现了来自不同传统的概念，如何延续反殖民政治路线，达成了卓越的传播和重新论述。

综上所述，这些以地理为基础的方法，无法作为帝国主义立场的替代方案，也很难真的批判帝国主义立场。在这些方法之下，人们不知不觉地复制了帝国主义的预设。他们将地区、文化、民族或社会，本质化为不同的类别，同时预设了这些不同地理空间的特定知识属性。这种「地理认识论的本质主义」，仅是反映出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认识论当中的那种本质主义，很久之前，Edward Said 就警告过我们这种本质主义的风险，尤其是在《Orientalism》这本书里面。

> 反殖民主义立场的承诺

我们并没有打算抛弃特定思想家或理论的论述及语言传统，也没有要宣称思想发展和制度脉络是完全无关的。然而，我们认为，光凭地理和身份本身，是不足以界定和分类那些持不同观点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理论的。因此，这本书将会把理解社会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基础，建立在反殖民主义，而不是地理身份或位置之上。为了提供一个真正能够替代帝国主义立场解方，我们将以反殖民主义立场——我们将其定义为反对帝国主义，并反对作为其主要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立场——为核心焦点。这样的立场所促成的，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与理论传统，并且以「反殖民主义」为其标志。

与某些知识论研究试图重新以「本土」、「非西方」或其他形式的思想为中心不同，这种以反殖民立场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并非、也不可能「外在于」或「脱离」所谓的西方思想。相反地，反殖民思想家在对抗欧美帝国主义时，批判性地使用了欧洲的思想传统。这些反殖民思想和理论，正是在批判地审视帝国主义立场的思想和论述的过程中所形成。反殖民思想家试图扩展或修正马克思主义思想、都市社会学或欧洲哲学的脉络，就是这种批判性使用的典型案例。此外，反殖民思想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偏限于「全球南方」这样的单一地理空间的，其广泛传播于殖民母国与殖民地、甚至整个殖民世界之间。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源自中国的反殖民主义和革命解放战争，并被非洲和亚洲各地的反殖民思想家和行动者接受、重新诠释。我并不是要否定具中心的结构性权力关系，而是希望人们能够肯认反殖民主义社会理论家们，如何建构了在边缘

地区传播的理论和思考方式，并强调相较于全球权力体系的中心来说，这些关系并不总是水平的，也可能是垂直的。

> 我们迫切需要反殖民主义

我们不会浪漫化、或是不加批判地推崇反殖民立场。反殖民的任务，亦即重塑殖民世界的秩序，本来就不是如此单纯。某些反殖民思想，也确实未能完全避免本质主义的身份宣称，或者是阶层制度、基本教义派等倾向的影响。我们关注反殖民思想，并非因为我们假设它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毫无瑕疵，而是因为它蕴含着的理论和政治潜力。它提供了丰富的理解、想像、概念与范畴，并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帝国主义立场，以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传统社会科学中，所难以表达，甚至遭受压迫与忽视的。

最后要提醒的是，我们并非要暗示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帝国主义仍然以持续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一些地区仍然是正式的殖民地，例如波多黎各、马提尼克岛和安圭拉岛。联合国认为，目前仍有16个地区处于殖民统治的状态，总人口约200万。另一个例子，是正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场以摆脱犹太复国殖民主义为目标的民族解放抗争。与过去相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以各种形式延续，并且遭遇了新型态的反殖民抵抗。不管是在大都市的中心，还是在这个新殖民主义的世界中皆是如此。现今的情境下，我们更加需要强而有力的理论工具和批判视角——我们认为，唯一的解方，便是反殖民主义的社会思想和理论。■

来信寄至：Julian Go <jgo34@uchicago.edu>

> Darcy Ribeiro

与来自南方的全球理论

Adelia Miglievich-Ribeiro, Federal University of Espirito Santo, 巴西



1985 年，Darcy Ribeiro 和 Oscar Niemeyer 访问巴西利亚大学。
图片来源：中央档案馆/UnB

巴西社会科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 Darcy Ribeiro (1922–1997) 留下了近千页的著作。尽管他在拉丁美洲作家中成就斐然，其著作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共出版了 90 个版本，但在巴西学术界，针对他研究的关注仍相对不足。与他相关的学术论文数量稀少，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几个因素：包括学界对其意识形态立场的分歧、对他坚持「参与性知识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 角色的反感，以及在理论被视为过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对一般理论的坚持。

1964 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当时的总统 João Goulart 被推翻，而 Ribeiro 作为执政政府的一员，也与总统同样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期间，他自我认同为一名「拉丁美洲公民」，Ribeiro 活跃于整个地区的知识与政治活动之中。并 1979 年大赦后返国，他加入巴

>>

西工党（PDT），投入于民主重建的工作，延续其一贯的政治与学术实践。

> 一个长期的视角：观察文明发展的历程

为了理解拉丁美洲长期以来的专制倾向与持续的发展滞后，Darcy Ribeiro 试图提出一种宏观的历史视角。他认为，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导致拉丁美洲人民沦为「外部无产阶级」（external proletariat）。然而，为了掌握这一的历史特殊性，他首先试图将拉丁美洲置于全球文明演进的脉络中，追溯自约 14,000 年前以来的发展历程。

他提出一系列问题，以探索文明分类与历史定位的可能性：我们该如何分类那些从先进文明发展而来，或是作为回应殖民征服而改变的前农业部落？如何定位原住民族与欧洲征服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理解那些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被迫迁移、并在美洲成为奴隶劳动力的非洲人所扮演的角色？在欧洲征服者中，最早抵达的伊比利亚人与后来接掌广大区域的北欧移民，他们是否代表了相同类型的社会文化体系？最后，我们又该如何根据各地民族社会融入农商文明乃至现代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程度，对他们进行分类并建构出彼此间的历史关联？

Ribeiro 年轻时深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对古近东水利文明的分析。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土地由法老所有，并透过官僚体系加以管理，由此统筹农业规划与劳动力分配。Ribeiro 挑衅性地将伊比利亚与拉丁美洲纳入这个全球文明的分析框架中，并回应批评者的质疑：「[尽管如此，我仍保有相信自己是马克思继承者的权利。](#)」

他主张，科学论述应透过对社会背景与观察者立场的敏锐关注加以重构。与马克思一样，Ribeiro 强调观察、比较与诠释作为通往社会体制转型路径的必要性。他写道：「我们正是以这样的姿态撰写《[文明的历程](#)》……」

早期著作中，Ribeiro 对科技发展进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识别出自十四世纪以来的十二种文明进程与十八种社会文化之配置。他意识到过度概括的风险，但仍坚持理论建构的整体性，尝试整合同步与异步的历史动态。他的目标是建构一套有力的比较分析框架，避免将不同社会阶层化，而倾向以关系性的方式进行解释。

> 奇异的文明发展历程与科技创新

Ribeiro 采取的是一种多线性的新进化论立场，与传统的单线性进化论（如单一因果或目的论模型）成为区别。他主张一种「不一定要成为进化论者」的历史观，强调进化不应被视为线性、单向的发展，而是一种理解社会变迁（包括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所不可或缺视角。对他而言，进化指的是一个群体在特定环境条件与历史事件所设置的限制中，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建构其生存方式。这种建构可能会结晶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但本质上仍是暂时性的与历史性的。

Ribeiro 的分析跨越多重抽象层次。他运用「文明历程」这一概念（与 Alfred Weber 的用法相近），同时也关注特定文明的单一发展路径（类似 Sorokin 所称的「文化超级系统」）。他认为，科技革命的影响范围虽然重要，但比起 Gordon Childe 或 Leslie White 所提出的广义「文化革命」而言，仍然较为有限。他将自己所谓的「文化历史配置」（cultural-historical configurations）视为对应于 Julian Steward 在文化生态学研究中所提出的「文化类型」，借此连结社会形构、技术条件与历史脉络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 Ribeiro 而言，技术革命代表着人类与自然互动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意味着社会形态的质变。这些革命透过能源使用方式的变化来塑造文明的发展路径；而能源使用的转变既受到人类条件的制约，也同时受到人类行动的塑造。不同的进化阶段并非以线性方式依序发生，而是透过群体对环境复杂条件的成功适应而浮现。除此之外，技术创新也从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嵌入于一个三元系统（tripartite system）之中的，而每个系统皆具有其内在结构：（一）适应系统：关涉人类生产与再生产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方式；（二）联想系统：指规范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制度与组织；（三）意识形态系统：涵盖所有形式的象征性沟通，包括语言、知识、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与行为。

> 对于现代化与演化速度的反思

Ribeiro 强调，科技发明可以是内部创新，也可能是外来扩散后被采纳。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吸收与应用模式。基于此，他提出两个关键概念：「反思性现代化／历史纳入」（reflexive modernization / historical incorporation）与「演化速度」（evolutionary acceleration）。

「反思性现代化／历史纳入」指的是一个民族在被迫接触到技术上更进化的社会文化体系时，丧失自主性，甚至导致自身作为民族实体的毁灭。这种「纳入」过程常常以「进步」的名义呈现，实则掩盖了退步、从属与去主体化的历史动力。与此相对，「演化速度」则代表一种另类的可能性，即在与外来文明接触的同时，透过主体性行动快速调整与创新，以主动、创造性的方式推动自身社会的转变。

对 Ribeiro 而言，「反思性现代化／历史纳入」并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一种停滞的状态。唯有当人民有能力自主定义自身的历史方向与发展目标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社会发展。

在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视角中，贫穷、饥饿、种族灭绝与物种灭绝从未被视为「进步」的象征。历史并不总是线性地朝向繁荣发展；「之后发生的事」未必就意味着更好的结果。当一种技术被「超效率地利用」所带来的，反而是大规模破坏，这正说明了进步神话的破绽。系统的崩溃并未带来任何在气候条件下的实质适应能力；相反，它们往往被自然条件压垮，陷入停滞、退化，甚至最终走向消亡。

在当前全球面临生态退化与社会断裂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批判理论的观点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发展虽可能提升效率，却往往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对弱势群体造成外部性伤害。以欧洲的繁荣为例，其基础实际上建构在殖民暴力与资源掠夺之上；而在全球南方，许多地区仍深陷于日益恶化的贫困、战争、灾难与长期冲突之中。

> Darcy Ribeiro 与当代全球社会学

今日重读 Darcy Ribeiro 的著作，有助于深化当代全球社会学对「中心／边陲」的动态理解。他并不将中心与边陲视为静态、固定的地理或结构位置，而是作为历史过程中的两种运动逻辑：中心代表「进化加速」的轨道，边陲则是「反思性现代化」的结果——一种被动纳入更强势系统的历史轨迹。

这样的视角也邀请我们将 Ribeiro 的构想与当代理论家进行对话。例如，[Niklas Luhmann](#)在承袭[Maturana](#)和[Varela](#)的自组织理论基础上，将演化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加以系统化，这与 Ribeiro 对文明发展作为一种动态适应与沟通过程的理解，呈现出某些呼应之处。这也引发了重要疑问——文明，是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个体与自然环境之间成功沟通的制度化表现呢？

Ribeiro 的思想亦与拉丁美洲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者如 Ruy Mauro Marini、Vânia Bambirra、Theotônio dos Santos，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 Immanuel Wallerstein 形成共鸣。他们共同关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心与边陲的权力结构，以及来自边陲的「反系统运动」如何挑战世界秩序的结构性不平等。

全球社会学的发展中，实现对称性的知识对话已成当务之急。正如[S.F. Alatas](#)所指出，来自全球南方的理论不应陷入「天真的本土主义」（naive nativism），而应致力于培养一种叛逆的、世界性的社会学视野。Sujata Patel 主编的《[多元社会学传统手册](#)》（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便是这一多元论取向的典范，促进了横跨国界与地区的知识传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展望未来，将英语系的后殖民研究与拉丁美洲的非殖民思想、黑人研究、女性主义分支（subaltern feminism）以及美洲原住民族的认识论互相连结，将是极具潜力的路径。这些「新认知的主体」（new epistemic subjects）长期在地缘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但他们对于国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等现代性核心概念，提供了极具批判力与创造性的重新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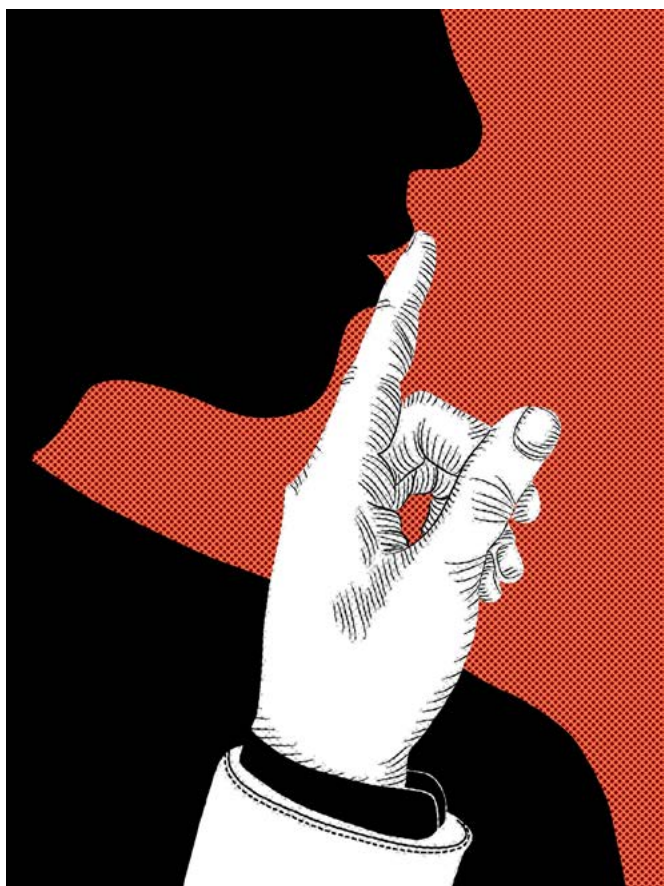
在这个多极、多元的知识世界中，Darcy Ribeiro 的思想构成了一座南北对话、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樑。他不仅是一位跨越边界的公共知识份子，也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原住民人类学家、政治实践者，更是一位风格独具的文学创作者。他的著作邀请我们思考：知识应如何从边陲出发、介入世界，并重新定义我们所理解的文明、进步与社会变迁。■

来信寄至：
Adelia Miglievich-Ribeiro <miglievich@gmail.com>

*本文改编自作者的著作[Darcy Ribeiro](#)，《文明与民族：拉丁美洲的社会理论》，Routledge，2024 年。

> 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工具化与对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的多重压制

注：本文作者选择匿名，以避免来自其任职机构、德国媒体、政界人士以及更广泛国家机器的潜在报复。



出處：Freepik。

2025 年 2 月 19 日，联合国「被佔领巴勒斯坦领土」特别报告员 Francesca P. Albanese 应柏林自由大学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教授与学生之邀，发表题为〈蓄意毁灭的生活条件：对加萨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的法律与鑑识观点〉(Calculated to Destroy: Conditions of Life Calculated to Destroy – Legal and Forensic Perspectives on the Ongoing Gaza Genocide) 的演讲。然而，由于安全考量，校方在活动前夕取消了他原订在校内的现场演讲。最终，该活动转移至其他地点举办，并以直播形式在大学内播放。Albanese 因其对以色列在加萨地区行为的批判立场，遭到德国多位政治人物与媒体的攻击。柏林市长、柏林市政府负责科学事务的参议员，以及以色列驻德国大使，皆施压要求校方取消此次活动。以色列大使甚至指控该演讲是「哈马斯支持者的训练营」。德国媒体亦加入报导谴责，形容 Albanese 为「受到国际广泛批评、极端仇恨以色列的狂热份子」。事实上，早在此活动一周前，慕尼黑大学 (the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便已基于类似理由取消 Albanese 的另一场演讲。对于接连不断的取消与施压行动，Albanese 表示：「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如此全面地在政治压力下屈服。」

> 沈默的异议者

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来，作为全球声援巴勒斯坦、反对加萨种族灭绝社会运动的一环，德国也出现了高度动员的抗议行动与公共表达。然而，这场运动在德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制。根据政治社会学与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献，「噤声」可理解为一种有系统地压制、边缘化，或使批判主流叙事与权力结构的声音失去合法性的过程。这种压制往往透过制度、法律、政治或语言等手段实施。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00件公开报导的取消事件，包括学术讲座、研究邀请、文化活动、艺术表演、电影放映、甚至奖项颁发。街头抗议也遭遇警察暴力，柏林更曾禁止在示威中使用阿拉伯语。

本文聚焦于在德国学术界与公共领域中，反犹太主义如何被政治性地工具化，成为压制批判以色列政策与声援巴勒斯坦言论的手段。我们特别强调一项机制：将特定、策略性建构的「反犹太主义」定义作为一种模糊而灵活的工具，以合法化各种形式的「沉默化」。社会学家 [Donatella della Porta](#) 将当前德国的反犹政治争议描述为「道德恐慌」，而 [Peter Ullrich](#) 则称其为「专制的反犹太主义」。这些概念共同指出：反犹太言论或行为的指控，已在意识形态、政治与策略层面，变成了一种噤声的武器。这种噤声机制根据具体脉络，在不同场域中以多样化方式运作。我们并不否认德国存在反犹太主义。这一问题深深植根于德国历史，也形塑了其反法西斯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传统。然而，我们所关注的是：当「反犹太主义」的标籤被一体适用地加诸于所有批评以色列政府、声援巴勒斯坦的言论或行动时，批判性言论与政治表达便遭到压制。这种不加区辨的指控阻碍了对战争罪行、种族灭绝、人权侵害，乃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及其人民所实施的有害政策与结构性暴力的诚实讨论，进一步扼杀了德国社会中极需公开、坦率与多元的辩论空间。

> 为什么要噤声？

许多来自德国以外的观察者对于德国社会普遍缺乏对「反犹太主义」作为噤声工具之滥用的警觉与抵抗，感到困惑。事实上，将「反犹」指控用于压制异议的情形在其他国家也屡见不鲜，其中尤以美国为甚。然而，德国的情况具有其独特性。

首先，这种特殊现象可部分从德国对大屠杀历史的回应以及其与国族认同与国家制度的连结中理解。作为对纳粹罪行的历史责任之一，德国将打击与预防反犹太主义视为国家首要任务。这种承诺深植于其法律框架、政治论述与教育制度之中，并将「以色列国家的安全」与德国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紧密相连。

其次，这样的制度性建构也塑造了德国社会的价值观与认同模式，形成一种特殊的「道德自我」意识。部分德国左翼甚至采取所谓「反德意志」（[anti-German](#)）立场，认为德国的国家身份与其法西斯过去密不可分，进而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视为历史赎罪的一部分。在这种脉络中，任何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都容易被视为反犹太的表现。这种由历史罪责驱动的记忆文化，导致了德国诸多机构、公共媒体与公民社会，在跨越政治立场的情况下，对以色列政府展现出几近无条件的支持，使得细致、具批判性的辩论变得困难。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内的极右翼势力——尽管其本身是当前反犹太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却也积极支持压制声援巴勒斯坦的言论与行动。这一策略性的立场为他们的反移民、反阿拉伯以及恐伊斯兰的种族主义政策提供了掩护，使得针对穆斯林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言论与行为得以在「保护犹太人」的道德语境下获得正当化。

最后，主流社会中仍有许多人，虽不明确隶属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或团体，却因为担忧「说错话」、被

误解或遭到指责，而选择沉默。这种沉默不仅源自制度与舆论的压力，也来自于对言论风险的真实恐惧。此外，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德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密关系，并非仅仅出于历史责任，而是建立在长期稳固且具高度利益的经济与军事合作基础上。德国是以色列在欧洲最大的贸易夥伴，双边关系涵盖广泛的投资与产业链合作。数十年来，德国也是以色列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且从 2022 年到 2023 年，德国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量大幅上升，使本国军事工业从中获益匪浅。两国的[军事合作历史悠久](#)，且持续扩展中。

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主流媒体普遍缺乏开放的辩论与批判性的报导。关于以色列的新闻报导往往呈现出不对称与带有偏见的叙述，对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苦难与死亡则经常被淡化、边缘化，甚至完全忽略。而任何声援巴勒斯坦或关注其人权处境的言论，则时常被贴上「反犹太」、「[哈马斯支持者](#)」或「[仇视以色列者](#)」等标籤，进一步削弱了公共讨论的空间与正当性。

> 在德国，反犹太主义被建构为一种灵活而模糊的镇压工具

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提出的[反犹太主义工作定义](#)，为「反犹太主义」作为压制工具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被德国各类机构广泛采用。这一定义长期遭到批评，认为其对「何谓反犹太主义」的界定[过于模糊](#)，导致几乎所有对以色列国家或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都可能被[视为反犹太言论](#)。由多位学者与法律专家撰写的《[耶路撒冷反犹太主义宣言](#)》（Jerusalem Declaration on Antisemitism）中明确指出，IHRA 的定义缺乏区辨「真正的反犹太言论」与「针对以色列政策的合法批评」的能力，容易被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策略性地滥用。这种模糊性已在德国体制中制度化。

德国议会近期通过了两项政府决议，并获得所有主要政党一致支持：其一为 2024 年 11 月 7 日的「永不再来——保护、维护并强化德国犹太人的生活」；其二为 2025 年 1 月 30 日的「打击学校与大学中的反犹太主义与对以色列的敌意（Israelfeindlichkeit），并确保自由论述空间」。这两项决议要求公共机构，特别是学术与文化单位，依据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的反犹太主义定义，识别相关言论与行为，并授权建立制裁机制。第二项决议尤为关键，明确列出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支持或参与「抵制、撤资与制裁」（BDS）运动及类似行动的个人与活动。IHRA 的模糊定义正被用作打压异议的合法化工具，尤其针对大学校园，使其成为政策打压的主要场域。

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学者、律师与研究反犹太主义的专家，均对这两项决议严厉批评，认为其对学术自由构成重大威胁。这些决议表面上以「保护犹太人的生活」为名，实则成为压制知识交流与建构的专制工具。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们为未来政治力量干预教育领域开启了先例，例如将对国内外学者的反犹太主义指控「定性化」的做法常态化。此举不仅会加剧自我审查与寒蝉效应，也将严重限制德国大学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自由对话与合作。值得注意的

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Ken Stern](#) 近期公开表示：「该定义的设计初衷并非用来作为抑制或冷却大学校园言论的工具。」

> 学术界的沉默以对

一份由[沉默档案](#) (Archive of Silence) 记录的清单，整理了与支持巴勒斯坦立场有关的公开事件，包括讲者邀约、会议与工作坊的取消、学术职位的撤销，以及研究奖助金的中断。例如，科隆大学取消了哲学家 Nancy Fraser 的客座教授职位；英籍巴勒斯坦外科医师、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Ghassan Abu Sittah 博士则遭到禁止入境德国。然而，这些公开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发生在幕后的、非正式且未公开的噤声行为，迄今仍难以系统性地记录与追踪。在德国各地大学中，噤声似乎已普遍存在，学者之间经常私下交流彼此在不同院校所目睹或经历的案例。以下是一些来自希望匿名的受访者分享的具体例子：

- 一位研究员因签署一封呼吁对加萨提供人道援助的公开信，遭教务长告知有匿名家长（据称为犹太学生的家长）投诉其「反犹太」，对犹太学生构成安全威胁。该研究员为保住合约，被迫撤回签名。
- 一位客座教授因担心校方干预与媒体反扑，选择不邀请持亲巴立场的讲者。
- 一部巴勒斯坦纪录片的放映被以「安全考量」为由取消。
- 一场关于（解）殖民主义与巴勒斯坦议题的讲座系列，因可能涉及仇恨言论，未获校方批准。
- 大学高层干预校园中讨论「抵制、撤资、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简称「BDS」）运动的活动安排。
- 一位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被禁止在课堂上使用「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一词，理由是这个词可能引发学生情绪上的不适。

这些案例的当事人几乎全是处于不稳定聘雇状态的学术人员，例如博士生、博士后研究员与非终身职教授，其中多数还是非德国籍。普遍而言，噤声的理由往往来自对媒体曝光的恐惧，或是对学生情绪反应的过度预设。

有些大学已成为学生抗议行动的焦点。部分大学领导层曾要求警方以武力驱离校园内的示威学生，亦有数所大学对学生提起法律诉讼，使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并导致学生被处以罚款。像是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与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等校，已明确禁止学生在校内进行抗议活动。[德国媒体](#)，尤其是通俗小报《BILD》，则对大学施加压力，要求撤换那些在支持学生抗议权利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教授，并将这些教授贴上「反犹太仇恨言论者」的标籤。在一个罕见的案例中，柏林的爱丽丝萨洛蒙柏林应用科技大学（Alice Salomon Hochschule）校长拒绝报警驱散参与抗议的学生，结果被媒体指控未履行保护教职员与学生的责任。保守派政治人物更进一步[要求他辞职](#)。最近，在 2025 年 4 月，柏林移民局对四名非德国籍学生启动[驱逐程序](#)，理由是他们曾在大学校园内参与抗议行动。

> 街头抗议中的沉默

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起，反对加萨种族灭绝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地，包括德国。参与者涵盖多种团体：社会运动参与者、非政府组织、草根运动、和平倡议者、国际人权及团结组织（其中包括犹太人团体），以及德国的反种族主义与亲民主派系。然而，这些街头抗议活动因被贴上反犹太主义标籤而遭受严厉镇压，包括警方的强力实体压制与地方政府的法律限制，且此类措施常获得通俗小报与部分主流媒体的支持。

柏林作为欧洲拥有最多巴勒斯坦散居人口的城市，于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0 月间爆发了逾百场抗议活动。抗议者遭遇防暴警察的严厉对待、人身暴力、逮捕及禁令。警方屡次采取升级策略，导致[数百人被抓](#)（包括儿童），并以煽动、恐怖主义嫌疑和支持哈马斯等罪名起诉。在部分案例中，这些指控进一步造成对于非公民的人们之递解出境程序。

当局运用多种策略压制抗议行动。2025 年 2 月，柏林地方政府禁止抗议口号及标语中使用阿拉伯语，并禁止使用鼓声，意在确保警方能听见阿拉伯语歌曲。部分媒体，如通俗小报《BILD》和《BZ》，不仅支持此语言禁令，还呼吁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阿拉伯语被污名化](#)，且被描绘成为了「宣传罪行」的语言，进一步激化反穆斯林与反阿拉伯情绪。

严厉镇压的背后，其实是被广泛运用的反犹太主义，并以此合理化对示威者的暴力与压制，却掩盖了当地深层社会背景。以柏林为例，许多抗议发生于新科隆区（Neukölln）与克鲁兹伯格区（Kreuzberg），这两地区聚居大量阿拉伯移民，长期以来是激进主义与政治动员的重镇。由于移民人口众多，这些区域经常被标籤为「问题区域」，警方与示威者间的冲突历史悠久。当局针对这些抗议的镇压，不仅限缩了集会自由，更强化了种族化治安体系，并扩大了国家对异议声音的监控与控制。

> 反犹太主义的工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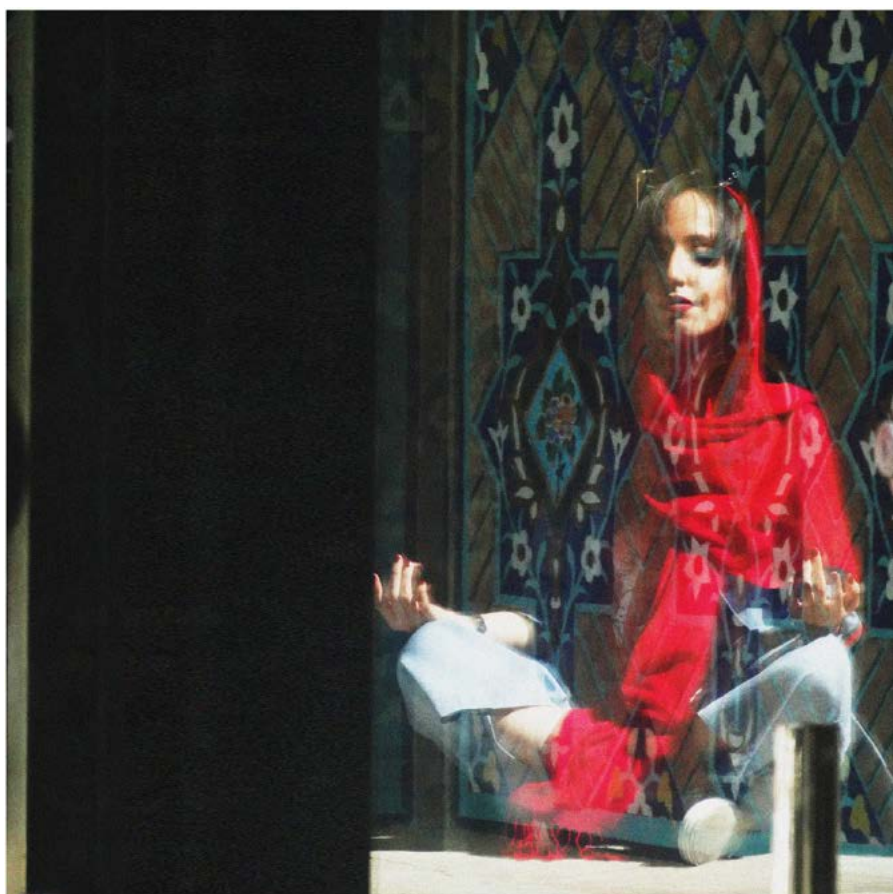
反犹太主义的工具化涉及重大利害关系：它被用来压制对以色列政策、军事行动及种族灭绝的合法批评，在德国助长了一种日益专制的社会与政治氛围。这种现象，影响了相当多的层面：首先，它使政治意识形态渗透研究与教育领域，对学术自由构成直接威胁。其次，它对集会与抗议权利实行双重标准，将移民社群——尤其是讲阿拉伯语的群体——标籤为犯罪者，从而在德国社会中加剧反穆斯林与反阿拉伯的种族主义氛围。这一现象也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正常化，使其得以转移公众对自身极右反犹太主义倾向的注意力。因此，反犹太主义的政治化成为一种噤声的工具，不仅阻碍了针对真正反犹太主义的有效打击，也限制了德国内部对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与反犹太主义的实质讨论。

这种在种族、仇外和反犹太主义面向严重受限的论述空间，替未来进一步压缩公民社会自由开创了危险先例。反犹太主义作为一种多面向，且策略性部署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噤声工具，将德国推向一条危险的道路，可能加剧其国际孤立。这样的现象，也令人联想到「德意志特殊道路」（德语：German Sonderweg，英文：German exceptionalism）的历史阴影。在当前全球脉络下，德国的发展既是一个警示，也是行动的号召——强调必须保护言论自由、抗议权利与研究调查的精神，以维护全球正义的核心价值，并共同抵抗遍布各地的战争与种族灭绝行径。■

> 破碎的城市：

对伊朗反女性都市主义的批判

Armita Khalatbari Limaki，独立研究者、建筑师与设计师，伊朗



红领巾，德黑兰尼亚瓦兰宫殿群，2014年。
出处：Armita Khalatbari Limaki。

要 处理女性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她们在重大城市决策过程中隐身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性的辩论，特别是在一个具有宗教法律的国家背景下。这篇短文将触及在这种情境中对女性所造成的不平等案例，并深入探讨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法律文件上所记载内容之间的明显落差。我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理论性的，透过批判性的视角，我旨在探讨女性、城市空间与社会正义在特定文化框架下的复杂交织关系。

> 没有任何标志能唤起女性的环境氛围

大约二十年前，伊朗提出了一项名为「女性专用公园」的都市计画，其构想是为了强化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自由与社会活力。该计画的目的是透过划设特定的城市公共空间给女性使用，来营造安全与舒适的感受。这些公园设计有繁茂的绿树、喷泉和缤纷的花卉，然而，

当时施行的法律却传递出完全不同的观念，与休閒空间的基本目标背道而驰。因此，除了少数想要在这些公园中出现的个人外，大多数女性都认为这些空间中的安全与平静是一种人为且不真实的构造，是透过压迫且不公的过程强加于她们身上的。

这项计画失败并缺乏吸引力的原因，源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也就是认为某些本质上无法分割的事物，其实可以被切割开来。有些特质是无法被限制在特定空间中的；这些特质必须流动于城市的基因之中。然而，当试图将如此具动态性的特质指派到某个特定地点，并幻想能够捕捉那些不断变动的事物时，最终只导致一种疏离感，因此也就注定失败。正如同在城市中不需要任何标志或标籤就能唤起一种阳刚氛围一般，仅仅在公园入口处设立一个标示，也无法营造出一种女性的环境氛围。

> 将无形且流动的特质限制在界线之内，
会导致情感的破碎与分裂

当公共空间的配置被用来在城市某些特定区域中营造活力与热情时，类似的问题就会浮现。我并不是在否定为不同用途进行土地分区的做法本身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我所指出的是一个更根本的断裂，也就是一种更深层的「情感分区」——这是一种既必要又无所不在，却从根本上无法被界定或限制的概念。像是满足、喜悦、通透性、以及对环境的熟悉感等特质，这些被视为健康城市的基本要素，并不受任何法律或规范所左右。

当空间系统透过将这些无形且流动的特质划分到特定地理区域中时，我们并非将它们视为城市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享受，而是只允许它们在有限的范围内展现，最终导致一个无效且不完整的结果。这种做法等同于默许城市应被切割成若干片段，并对每个片段期待特定的表现形式，而不容许它们超越其界线。

因此，尽管随着公共公园与休闲中心的扩展，「愉悦生活体验」的总量有所增加，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城市中无法形成连贯的情感景观。反而会出现分散在城市各处的零散式情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连结，市民只能被迫在特定地点寻找并内化这些情感，才能感受到那份情绪。最终，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期待人们展现适度的行为，而要达成集体的满足与安适几乎是不可能的。

> 一座城市永远反映其居民的样貌，
而这些居民无法被自上而下的阶层式规划所改变

我此处批判的对象，是那些旨在减少现实混乱的决策，因为这些决策反而加剧了原本的困境。当它们优先追求视觉上的秩序，而忽视生活内在的秩序时，尽管本质上带有规训性，却与法律和传统契约等既熟悉又合理的模式一同制造出一种新的紧张关系。事实上，正因如此，[忽视人类行为动态特性](#)的僵化且静态的分区规划注定会失败：它们要么成为展示和放大罕见特质的仪式，要么是逃避责任的手段。

这种阶层式的体制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保持沈默，且似乎试图以一个固定且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个体，最终导致社会分裂成不同阶级的片段。有些人对强加于他们的秩序感到满足，而另一些人则被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贫穷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行为暴力、犯罪与违法现象变得司空见惯，而普遍的满足感则成为罕见且珍贵的宝石。

这意味着，由个体所处的物理位置所决定的阶层结构，首先会逐渐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事实上，[这些城市规则应该先与城市中现有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和社会准则相契合，而不是期待城市去遵从那些陌生的指令。因此，尽管法律与规章对于控制城市发展是必要的，但若缺乏对承载社区独特特质的存在意义与承诺，这些规则将变得无效且毫无价值，使文化转型成为不切实际的期待。■

来信寄至：
Armita Khalatbari Limaki
<armita.khalatbari@yahoo.com>

